

# 新常态·新金融·新未来

石建勋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常态·新金融·新未来 / 石建勋著.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02-48705-0

I. ①新… II. ①石…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IV. ①F1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5974 号

责任编辑：吴 雷  
封面设计：汉风唐韵  
版式设计：方加青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王静怡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mailto: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14.25 字 数：317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定 价：65.00 元

---

产品编号：073207-01



# 前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在这个世界中，国家间的竞争变得“文明”，在各国的“文明”竞争中，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格局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

始于 2007 年年末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仅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也引发了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格局的大调整、大博弈和大动荡，引发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大思考、大讨论。值得庆幸的是，此次金融危机并未引发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都在理性思考、密切合作，采取和平手段应对危机，渡过难关，为应对危机诞生的 20 国集团首脑峰会便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2016 年年初以来，欧债危机尚未根除、英国脱欧公投成功、美国两党恶斗选举丑闻不断、北非中东颜色革命后动乱不息、恐怖主义持续并蔓延至欧洲、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欧洲难民潮不堪重负、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上台后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独立事件，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当今世界，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重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制度危机，无论是在全球治理层面还是在国家治理层面，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制度变革远远落后于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新制度供给严重短缺，导致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和恐怖主义蔓延。人们不禁要问，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是一个人民的艰辛劳动从未有过财富巨大增长的时代，又是一个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空前加剧的时代。

这是一个地球报复人类破坏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世界。

这是一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崛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重组和洗牌的世界。

从“一人一票”普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凯旋”到目前的“后危机、后真相、后秩序”，西方精英们的自信不再。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民主”和“自由”——被许多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视为构建 21 世纪社会的两大支柱正严重变形与异化，已成为

世界动荡的主要来源。全球性的社会制度危机使世人感到无望，人类更好的社会制度在哪里？

中国正在创造历史、正在改变世界。

2012年11月8—14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非常普通的一周，但就是在这一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按计划召开并胜利闭幕，大会选举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负众望、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开拓进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取得了众多的伟大胜利。中国正在创造历史、正在改变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5年。5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全面加强了党的领导，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和号召力。因此，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力地推动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我们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治国，显著增强了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了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迈向新台阶。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营造了我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了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提高，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在全球性制度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渐被世界认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经过95年不懈奋斗和持续改革探索中建立起来的，这一制度的独特优势造就了人类进步史上的发展奇迹，30多年来，国力迅猛发展，国际地位也快速提高，世界风景中国独好。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拍·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雷默坚持认为，中国自己摸索和创造出的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具有普世价值，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也可以作为一些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典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深深地与世界紧密融合在一起，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互为机遇、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中国的开放发展不仅为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世界走向共享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了力量。今天的世界，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力日益增加，世界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中国智慧、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中国投资等。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梦。每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价值。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我们要在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也要通过实现自己的梦想，来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建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四梁八柱”。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正在开展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伟大奋斗。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十八大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新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新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在国家之间合作、竞争和博弈中，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中，积极参与并主导世界治理结构和经济秩序的调整和优化，及时发出中国的声音，提出中国的主张和要求，不仅是国家权威部门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学者的责任和义务。笔者在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的基础上，紧密关注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件、举行的重要会议，五年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一版“望海楼”专栏、《文汇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大公报》《新华网》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代表性文章。这些文章被及时翻译成多种文字，多次被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新华社、德新社、美国彭博新闻社、《华尔街日报》《联合早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世界著名媒体和上百家国内外知名网站报道或全文转载，向世界及时发出了中国的声音、看法和主张。中宣部《新闻阅评》曾高度肯定了其中的一些文章。另外，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近年来，作者研究撰写决策咨询报告近40篇，本书也收录了作者部分不涉密的决策咨询研究报告。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主要收录的是研究分析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历史背景、发展趋势和演变规律的相关文章；第二部分是“金融改革发展新趋势”，主要收录的是研究分析新常态、新开放格局下，互联网金融、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监管改革等金融发展新热点、新问题和新趋势的相关文章；第三部分是“新未来：世

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新作为”，主要收录的是研究分析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新格局、新特点和新动向，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担当和作为的相关文章；第四部分是“新未来：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主要收录的是学习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以及如何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的相关文章。

未来，笔者将坚持继续讲好中国故事、阐述中国道理、传播中国文化，为党和国家发展、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坚定“四个自信”和增强“四个意识”，弘扬正能量、普及和传播经济和金融理论而努力学习和研究，力争撰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石建勋

( [sjx12188@126.com](mailto:sjx12188@126.com) )

2017年6月末于同济大学



# 目 录

## 第一部分

### 经济发展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演变逻辑分析及展望·····	2
金砖国家货币金融合作对经济新常态的影响和展望·····	5
当前新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风险及对策建议·····	9
中国经济需要三个“新”·····	13
新常态下锻造新优势·····	15
7% 增速：有益中国，有益世界·····	17
新常态 新亮点 新举措·····	18
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20
中国经济：韧性正在增强·····	22
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24
中国经济新常态趋势分析及战略选择·····	25
唱衰、做空中国？笑话！·····	32
经济增长目标 6.5% ~ 7%，如何看？·····	33
“区间调控的新方式”新在哪儿·····	34
两会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心·····	35
达沃斯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心·····	36
“1+6”圆桌会释放哪些信号·····	38
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有底气·····	39
正确理解中国经济的 L 型走势·····	40
把握稳中求进的新内涵、新举措·····	42

## 第二部分

### 金融改革发展新趋势

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的战略取向.....	46
防范金融风险须审慎推进注册制改革.....	52
着力构建资本市场六大平衡.....	56
“钱荒”：“荒”的到底是什么.....	60
当前境外“热钱”中国流向.....	63
互联网金融创新理论及其对传统金融的挑战.....	66
“互联网+金融”需要创新监管方式.....	68
有关互联网金融三个争论的再思考.....	69
人民币国际化要循序渐进.....	71
人民币汇率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需要改变.....	73
人民币不会形成长期性贬值趋势.....	76
世界有理由对人民币有信心.....	77
人民币“入篮”惠及世界.....	79
上海自贸区布局新一轮金融开放创新.....	80
中国金融改革如何知难而进.....	83
稳妥构建金融综合混业监管体系.....	87
金融合作可以走在中英合作前面.....	88
上海争取设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试验区的思考建议.....	89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几点建议.....	94
积极推动上海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思考建议.....	97
维护金融安全 给经济注入新鲜血液.....	101

## 第三部分

### 新未来：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新作为

欧元区十年：回顾与展望.....	106
影响欧债危机三大事件解读.....	108
如何应对欧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109
日本量化宽松无助经济复苏.....	111
“通胀大竞赛”损害世界经济复苏.....	112
货币贬值全球没有赢家.....	113

中国降息因应国际货币“宽松潮” .....	114
世界为什么需要金砖银行 .....	116
亚投行为世界经济增添新动力 .....	117
金砖银行为世界带来正能量 .....	119
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	120
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担当 .....	125
为亚投行启动点个赞 .....	126
勿对亚投行抱成见 .....	128
世界需要亚投行 亚投行需要世界 .....	129
亚投行任重道远 .....	129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新平台 .....	130
二十国集团应成为行动队 .....	132
G20 杭州峰会：为何值得世界期待 .....	133
G20 杭州峰会的三大意义 .....	135
中国正走近国际治理舞台中央 .....	136
金砖机制为世界打造解决方案 .....	137
“杭州共识”彰显中国议程之世界贡献 .....	138
新年首访传递中国信心 .....	140
中国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	142
全球性制度危机及中国改革探索对世界的贡献 .....	143

## 第四部分

### 新未来：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

践行新理念 引领新发展——如何落实新发展理念 .....	152
认识把握发展规律的新飞跃 .....	156
如何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规律：善把大势、善谋大局 .....	162
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探析 .....	167
德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借鉴 .....	176
中国制造需要创造新优势 .....	180
“海淘爆款”突显中国制造短板 .....	182
推进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到强的历史跨越 .....	185
理性看待中美贸易不平衡 .....	189
共同搭建合作共赢新平台 .....	190



以新作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192
努力推进“一带一路”机制化、制度化建设.....	194
推进“一带一路”机制化、制度化的基础条件.....	196
迈向路路相连、美美与共的那一天.....	199
构建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国方案”.....	201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03
做大、做强新经济要出好“八招”.....	206
三步走：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如何实现历史跨越.....	209



—— 第一部分  
**经济发展新常态**

##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演变逻辑分析及展望<sup>①</sup>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陆续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将步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的“新常态”。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最高决策层首次使用“新常态”一词来描述中国经济。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常态演变发展的大逻辑和大趋势，才能更好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考察中国经济旧常态的特征。中国经济旧常态可理解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前的状态，主要有五个特征：一是经济高速增长，年增长率10%以上是常态；二是通胀率比较低；三是经济比较优势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以及对环境资源掠夺式开发和粗放式利用；四是经济发展失衡，增长主要靠外延式大规模投资建设扩张、房地产业过度投资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出口爆发式增长的拉动；五是高投资率、高储蓄、高杠杆率和低消费率是常态。

有关经济新常态的表述有很多，最新最权威的概括则是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在对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趋势性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五个主要特征，即：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显而易见，新常态特征还是趋势性特征。

<sup>①</sup> 石建勋.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演变逻辑分析及展望【N】. 光明日报（理论版），2015-01-29（16）.

##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关系是什么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产物或必然反映，中国经济已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成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因此，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需对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条件变化进行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打破了世界各国快速发展的美梦，其负面影响和持续效应仍然在发酵。金融和经济危机演变发展导致未来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趋势性特征表现为：一是危机导致原有全球分工体系和增长模式破坏，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方式，国际分工体系和增长方式将被重构；二是当前及可预见的将来，全球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和常态化，世界经济将持续呈现低速“弱增长”格局，在低速“弱增长”中转型，在转型中“弱增长”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三是世界各国为应对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将围绕国家自然禀赋的有效利用及国家对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展开博弈，导致资源纠纷、领土纠纷和国家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这将成为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发展的新常态；四是应对危机，世界各国对新能源、新材料、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将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消费革命和社会变革，这场系列革命的长期化和常态化，考验着每一个国家决策者和人民的智慧和决心，考验并衡量每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五是世界进入金融化生存竞争时代，在世界经济转型调整过程中，金融货币手段越来越多地成为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维护其经济与金融霸权的常态化手段。

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危机后可能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大规模、高强度的刺激经济政策不断推出，现阶段的危机后遗症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不稳定、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全球经济进入了一种非理想化的新常态。

曾经有人认为，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复苏乏力，唯有中国经济独好。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持续“弱增长”、国际分工体系和增长方式重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金融化生存竞争等世界经济新常态的现实环境而独善其身，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由旧常态转向新常态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组成部分。

##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旧常态的逻辑演进关系是什么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30多年快速发展旧常态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基础薄弱，物资极度匮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摆脱贫穷，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运用各种手段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加快发展是当时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如今，一年的经济增量，就相当于20年

前的全年经济总量。由于体量和基数变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在保就业、惠民生方面的带动效应明显增大；同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也成倍增加。除此之外，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产能严重过剩；全球总需求不振，外贸低成本比较优势削弱；生产要素的规模驱动力趋减；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各类隐性风险随经济增速下调显性化；全面刺激政策边际效果明显递减等。中国经济既“做不到”也“受不了”像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再加上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形成的倒逼力量，内外部因素叠加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

## 四、为什么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不仅是一个经济新词，也是一个新的哲学范畴，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经历了重大、剧烈的变动之后，往往出现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并且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发展是如此，社会发展的很多领域也是如此。新常态来自旧常态，但不是简单否定过去，而是变革和继承相统一的扬弃。没有过去 30 多年来快速发展奠定的物质基础，就没有现在步入新常态较高层次的发展阶段，就没有现在主动适应新常态的自信、从容和定力。

说到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充分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不仅需要“新认识”，更需要主动适应新常态的“新心态”“新观念”和“新举措”。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任务都有了变化，我们应该顺势应变，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经济新常态。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如何有效缓解和化解这一特殊阶段的矛盾和风险，保持中国经济在新常态条件下的稳定运行，不仅是经济界、理论界的一个新课题，更是中国经济的每一个参与者必须主动适应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

## 五、为什么要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无论是从理论和现实考察，还是从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的分析判断，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描述的新常态五大特征只是一种趋势性的理想状态，还不是已实现或已达到的现实状态。这是因为，一方面，新旧常态转换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那些旧常态的受益者、旧常态的习惯者都不可能自愿接受新常态。从国际上看，世界走向新常态的过程是国家间不断争斗和博弈的过程，旧常态的引领者和受益者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和美元不会自动退出霸权地位，维护或恢复美国和美元霸权的旧常态，获取霸权收益是美国一贯的国策，不可能轻易改变。从国内看，对增长率的崇拜和热衷与大拆大建的旧习惯短期内也难以根本改变，旧常态的受益者也不会自愿放弃既得利益。在旧常态和新常态的博弈中有许多不确定性，有反复、有矛盾、有冲突在所

难免。另一方面，理想中的新常态也不可能在某一天自然而然到来，必须要争取、要引领。从国际上看，平等、民主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开放公平互利的国际贸易新机制等新常态都需要健康的力量去争取、去引领。从国内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传统的动力和新的动力正处在一种胶着状态，传统动力的体量还是比较大，新的动力虽然代表新经济的发展方向，增长速度比较快，但体量还比较小。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这将导致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保持定力，继续加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同时也要进行适度的预调、微调，引领中国经济尽快进入增长稳定、结构优化、环境改善、民生福利提高的新常态，力争把经济稳定在一个合理、合适的区间，为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稳定的环境。

## 金砖国家货币金融合作对经济新常态的影响和展望<sup>①</sup>

### 一、如何理解和把握新常态

#### 1. “新常态”概念的提出

“新常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提出。他理解的“新常态”涵盖：“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体系下不可能简单回归到危机之前；危机后消费群体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商业环境也发生改变；“新常态”被西方媒体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则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出现这种“新常态”，实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犹存。

#### 2. “新常态”对美国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站在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埃里安提出的“新常态”对美国而言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个“新常态”意味着美国逐渐丧失全球化主导权，失去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机地位，美元霸权地位动摇，其世界银行的角色面临破产，所以，迄今为止美国官方不承认也不接受使用“新常态”，美国总统顾问也公开否定新常态。对“新常态”的到来，美国其实很焦虑也很无奈，先是希拉里提出用“巧实力”，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维持和恢复美国霸权，这实际上是试图恢复“旧常态”。当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收效不大，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对美国霸权严峻挑战的背景下，美国显得非常焦虑，为平息国内争议

<sup>①</sup> 石建勋. 金砖国家货币金融合作对经济新常态的影响和展望 [J]. 经济体制改革, 2015, (01): 44-47.

和给盟国打气，奥巴马发出了美国要领导世界 100 年的空洞口号，显示出美国应对各种挑战，试图恢复“旧常态”的乏力，美国霸权日渐衰落趋势难以挽回。无奈之下美国只有到处制造矛盾，然后积极调节矛盾，推行颜色革命，打乱其潜在竞争国家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步伐。美国所有的行为实质上都是想恢复和维持其霸权地位的“旧常态”。因此，我们对“新常态”的到来和顺利实现应该有深刻的分析和冷静的认识。

### 3. 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常态”特征

从国际经济关系角度总结“新常态”的特征表现为：第一，国际关系的平等化。第二，国际经济格局多元化。第三，国家货币金融体系多元化，即许多国家的货币都可能成为国际货币，虽然不能取代美元但是会挤占美元的份额。第四，国际分工合作的合理化、均衡化。比如，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大家习惯的国际分工模式是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中国积累外汇（美元），美国借钱过日子，而现在中国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美国实行再工业化战略，过去的国际分工旧常态就会打破。第五，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民主化，也就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要获得更多话语权。第六，国际经济增长的多级化、平衡化和可持续。

笔者非常赞赏中改院国际论坛认为“新常态”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新常态”是我们的理想状态而不是现实的状态。世界走向“新常态”的过程是国家间不断的争斗和博弈过程，在“旧常态”和“新常态”的博弈中有许多不确定性。现在国际经济中出现的“新常态”是不是我们理想中的“新常态”，这需要打个问号，历史上任何霸权国家都不会自动的退出历史舞台，都会想方设法阻止“新常态”的到来。

## 二、金砖国家在货币金融领域深度合作的基础扎实

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的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恐怕非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莫属。在 2009 年 4 月伦敦 G20 金融峰会上，当时的金砖国家以发表联合声明的方式首次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迄今已经召开了五次峰会，达成了多项协议共识，而这其中，金融领域的合作推进速度最快。其原因在于，虽然金砖国家之间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民族文化，甚至由于历史、地缘等原因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各国之间的合作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但在保护自身外汇主权财富、抵制发达国家的“货币战争”、促进世界治理结构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深化货币合作方面，金砖国家的诉求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目前，新兴经济体已超过发达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经济增长强劲的同时，金砖国家都成了对外净债权国，但由于这些国家货币还不是国际货币，都不是金融大国，国际金融话语权和货币金融手段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强，在世界金融化生存竞争的博弈中都处于被动地位。

另外，金砖国家的金融市场都不发达，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都是发

达国家利用竞争性货币贬值手段转嫁危机的直接受害者。金砖国家在对抗欧、美、日控制国际金融体系方面有共同的利益。金砖五国都是世界银行的主要借款人，同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贡献与日俱增，但五国在这两家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决策过程中没有获得和自身经济实力及贡献相应的话语权。

与其无限期等待发达国家的消极改革，不如幻想其自觉放弃在国际金融组织的主导地位，与其被动应付发达国家转嫁危机频频发起的“货币战争”，不如另起炉灶，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共同迎接世界金融化生存竞争的挑战。这就是金砖国家基于共同利益和诉求的不二选择。金砖国家朝向一体化大市场努力，显然有利于创造全球经济治理新机遇。

总之，金砖国家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共同点多：主权货币都为非主流货币，都希望货币国际化；在国际货币体系话语权与经济地位不对称；深受美元霸权的损害，都需要重建多元化货币体系；都需要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服务。

因此，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共同的诉求，共同的需要，金砖国家可以抛弃地缘政治及其他潜在的利益冲突，而在货币金融领域获得更深刻广泛的合作。

### 三、金砖国家货币金融合作是国际经济“新常态”的促进者和受益者

金砖国家是新兴经济体主要的代表国家，其货币金融合作是国际经济“新常态”的促进者和受益者，以下分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国际层面的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体系民主化，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多元化等改革，事实上金砖国家都在 20 国集团的多次会议上发出了集体的声音，促进了 SDR 份额的改革和投票权的改革。另外，金砖国家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完善和补充。

国家间的多边和双边层面的合作，将扩大金砖国家贸易与投资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砖国家货币合作、货币互换、货币直接兑换可以促进各自国家的货币国际化。金砖国家的自身改革与发展，包括体制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改革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无论是国际层面、国家间合作还是自身改革，金砖国家的深化合作都会促进国际经济“新常态”的实现，所以，笔者认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新常态”的促进者和受益者。

### 四、金砖国家如何适应和促进“新常态”

理想的“新常态”是公平合理的“新常态”，或者是一种多元化的新经济格局下的“新常态”，是在国家间斗争与博弈中逐渐达到的。

第一，充分认识和把握金砖国家走向“新常态”面临的困难阻力和挑战，例如，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受到美国极力地阻挠，因为美国认为中国会影响或者威胁它的霸权地位，这种阻挠在未来可能会不断的增多。

第二，将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提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求同存异，增强互信，深化深入合作的体制、机制。金砖国家虽然成立了金砖银行，有过几次会晤，但合作的基础不深，因为金砖国家的政治文化有差异，还有一些地缘政治的矛盾，这都会阻碍金砖国家间的深入合作，所以有必要加强互信并构建长期信任合作的基础和机制。

要逐渐把金砖国家由对话论坛和在有限问题上协调立场的机制转变为形式和功能完整、能在国际政治经济关键问题上进行协作的政治和战略机制。应本着求同存异、平等协商、循序渐进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和推进峰会机制，在建立官方多层次战略对话和协调机制的同时，加强非官方渠道的交流和沟通，充分调动民间积极性，特别是重视智库和专家的作用，成立专家小组对合作机制进行研究、确定合作的主要议题、定期对合作情况进行评估等，使各项务实合作机制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和多样化。

要建立和完善金砖国家内部争端仲裁与危机管理机制，妥善解决内部矛盾和争议，防止内部的冲突影响合作大局。其中包括：双边与多边经贸与投资合作争议的调解机制；双边与多边的人员交流、卫生防疫、救灾、社会安全等问题的应急综合反应和磋商机制；在联合国、联合国发展署、世界银行、G20、气候大会等框架下的立场磋商与协调机制等。

第三，从国际层面，加快推进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要坚持开放性，进一步提高金砖国家的代表性。作为一个开放平台，未来金砖国家在加强与完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的同时，也可考虑在条件具备时，吸收一些经济规模、发展程度、利益诉求相似的新成员，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等具有地区影响力的新兴国家。唯有如此，新兴国家才能不断壮大，真正与发达国家公平对等地对话，扩大规模增加代表性，有利于巩固和提升金砖国家的国际地位，增强务实合作的生命力。同时，努力支援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受害至深、有被边缘化危险的国家应对和克服金融危机，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第四，国家层面的合作。一是金砖国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促进本国货币国际化。二是贸易投资协议，推进经济一体化。金砖国家银行目前已经落户上海，货币合作互换协议在扩大，建议金砖国家进一步加快贸易投资协定的签署，金砖国家如果形成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推进各个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促进金砖国家的共同发展。三是金砖国家加强制度化创新，向世界贡献新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不能仅仅向世界贡献物美价廉的物质产品，还要贡献货币、思想、新的机制，未来金砖国家向世界供应的制度、公共产品会越来越多。四是通过实体项目合作加强金砖国家组织能力建设。一些对金砖国家合作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金砖国家之间缺乏合作项目作为桥梁和纽带将导致合作难以持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曾经提出了包括在能源、卫生、科技和金融领域开展一些具体合作项目。未来，应该加快这些项目的实施，增强金砖国家合作的实效性、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五，金砖国家自身面临很多问题，需要加快改革与发展步伐。在政治改革方面，金砖国家都面临着解决腐败、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实现社会民主法治和政治稳定，防范颜色革命；在经济改革方面，金砖国家，都要加快调整结构，推进经济转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

第六，世界经济仍然复苏乏力，从世界范围来看，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寻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三是寻求互惠互利的合作共赢点。当前，金砖国家要沉着应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带来的冲击。对新兴市场来说，美国退出QE后，虽然输入性通胀压力下降，但短期内本币贬值、资金流出以及与美国缩小的利差，将导致本国流动性趋紧。同时，央行通过放宽货币政策来补充流动性的能力受限，资产价格可能受到冲击。这些都需要金砖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未来各种挑战，为世界经济发展和走向“新常态”做出更大贡献。

## 当前新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风险及对策建议<sup>①</sup>

新经济，不仅泛指由新一轮科技、产业和消费革命所驱动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还表现为传统产业与新技术的融合发展。当前，我国新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困难、挑战和风险，不容忽视。

### 一、当前新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第一，现有经济管理模式和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于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比如，建立在资金投入、固定资产等规模性硬指标的传统行业准入门槛、分行业审批管理模式，已不适用于新经济的轻资产、重知识、重创新和跨界融合等特征，导致新经济企业创立时常遭遇行业准入的限制。民营企业是新经济主力军，但却面临诸多行业准入限制。在监管方面，由于新经济的市场主体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分布广泛，而监管部门的传统巡查式、运动式执法大检查难以适应一些新商业模式的市场监管需求。另外，诸多新兴领域出现了法律和制度空白。如网络租车市场存在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的问题，电子商务领域存在网络售假、网络欺诈、侵犯用户隐私等现象，互联网金融领域存在集资诈骗、监管套利等挑战，亟须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

<sup>①</sup> 石建勋. 内部研究报告 [R]. 2017- (03) .

第二，政府在促进新经济发展中存在某些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

(1) 越位。某些地方政府为促进新经济发展出台了一些不尊重市场规律的政策，试图通过补贴、土地价格优惠等手段激励市场主体，可能导致某些企业投资行为的出发点是获得政府补贴，而非满足市场实际需求。

(2) 缺位。初创期新经济企业往往需要政府提供诸如信息采集、行业标准制定、检验检测、法律咨询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支撑，但目前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传统的经济统计方法已跟不上新经济发展变化，难以准确和客观反映新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规模。

(3) 错位。某些政府部门对一些新经济出现的问题缺乏认真调查研究，而是按过去习惯的方式进行管控、叫停甚至扼杀，这只会对稚嫩的新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第三，新经济发展面临人才不足的短板。新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大批高素质、复合型创新人才的支撑。但目前一些新经济领域中已出现较大人才缺口，有机构估计，未来三年内仅电子商务行业的人才缺口就将达到 400 余万人。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难以满足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各类专业化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人才激励体系有待完善，如创新成果转化与收益等人才激励举措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人才在不同体制、机制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面临各种障碍。

第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共享机制亟待完善。信息（大数据）作为重要的资源，正逐步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当前我国在支撑新经济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大数据应用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信息的可获得性和流动性不高，互惠共享的数据应用环境尚未形成，“信息孤岛”“数据壁垒”等现象严重，难以建立适应新经济跨界融合的信息共享机制。目前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依然没有解决，既满足不了政府协同监管的需要，也满足不了新经济企业发展的需要。

第五，我国信用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还未充分建立。企业费时费力研发出的新产品、新技术，很快就会被“山寨”，特别是创意、数据信息类新经济企业受侵权风险极大，维权难度也大。此外，电子商务的粗放式发展导致假冒伪劣、市场欺诈、虚假促销等现象屡见不鲜，导致许多埋头创新、诚信经营的“良”企被“劣”企驱逐。伴随着电商规模不断扩大，对电商售假打击和监管不力，已成为阻碍我国新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毒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 二、新经济发展面临的潜在风险

第一，新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可能引发泡沫风险。一方面，由于一些新经济企业成长速度过快，导致了企业估值虚高。一旦高估值泡沫破裂，其风险和杀伤力巨大，值得我们警惕。另一方面，新经济发展过快也导致一些领域出现了盲目跟风、行为短视和投资过热现象。某些地方政府根据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目录，不顾自身条件和产业基础，盲目跟风建设一批产业园区，最终导致大量土地厂房空置，资源浪费。此外，近年来互联

网金融的野蛮生长也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局部性金融风险频发。要警惕的是，新经济发展以互联网为支点，可能会加速或放大发展过程中各种负面效应和风险，应予以高度重视。

第二，网络安全风险是新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潜在风险。新经济深度依赖于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其在给人们带来便利和创造价值的同时，也蕴含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一旦出现电网、光纤网、运输网或金融网络系统故障，就可能造成重大物理破坏和经济风险，后果不堪设想。亟待加强网络安全风险防范和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新旧经济利益格局矛盾凸显，处理不当可能引发社会风险。新经济发展在满足群众需求的同时也对传统经济造成了一定冲击，二者间利益格局矛盾凸显，如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电子商务与实体店之间的“冲突”就非常典型。新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备受来自传统企业的批判和怀疑。一些传统产业巨头常常抱怨和质疑电商等新经济对传统产业的冲击。若处理不当，不仅会对新经济本身的发展造成阻力，也会影响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可能会导致一大批人的就业和生计，影响社会稳定，风险不容小觑。

### 三、发展新经济的政策着力点

第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包容创新的审慎监管制度，为新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空间。政府要根据新经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加快职能转变，深化“放管服务”改革，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在保护产权、加强监管、维护公平、强化激励、集聚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正确发挥政府在新经济业态发展初期的引导作用，综合运用财税、金融等市场化工具促进新经济快速发展；梳理、修改与新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阻碍新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及其相关条款；要逐步放开新经济领域的行业准入，加快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新经济领域的产业负面清单管理，要把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作为硬任务，推动竞争性领域行业市场化改革，要由前置审批为主转变为依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加快建立服务新经济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联动，避免政策碎片化；推进跨部门、跨行业综合市场监管和综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适应新经济生产分布式、流动扁平化、消费个性化等特点，建立以信用和用户选择为核心的行业自律和事中、事后监管模式。及时发现、总结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引导新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第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要着力点包括：

(1) 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积极培育各类创新主体。既要大力发展高端创新产业，又要注重提高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积极发展大量微创经济，持续推进众创、众筹、众扶等新型创新创业模式。

(2) 加大重点领域科技攻关。要瞄准制约新经济发展壮大的核心技术瓶颈，加大核心技术和零部件研发投入，集中攻坚克难，夯实新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

(3) 推动构建大、中、小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创客等多方协同的“双创”平台，搭建多元化创新平台和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协同性，促进各方面创新主体充分互动，让信息、人才和资金等要素在各类组织之间有序流动，形成开放合作的创新网络和形式多样的创新共同体。

(4) 努力完善创新生态环境，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运行体制，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充分释放科研潜力。

第三，培育多层次发展主体，努力做大做强新经济。实施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工程，培育一批新经济龙头企业，引导产业上下游企业加强分工合作，有效拓宽新经济发展空间；利用大数据支撑驱动作用，努力在产业互联、行业精细化、精准营销等方面催生出更多的新经济形态；积极培育基于互联网的创业组织方式，鼓励、扶持基于大数据的创新和创业；支持领军企业和投资机构开设创客工场、创客学院、创客基金与众筹平台；加快建设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新经济示范区，形成各具特色的新经济运营与服务模式。

第四，加快创新人才培养，优化新经济人才成长环境。大力培养新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优化人才结构，是促进新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重点引进一批国内急需创新人才的同时，要探索建立与新经济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机制和职业培训体系，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新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培育和输送人才。创新新经济人才评价机制，为新经济领域的创新创业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激励，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才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快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取消妨碍人才自由流动的各种限制，营造创新创业的便利条件。

第五，加快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强化新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撑。新经济企业多为轻资产型创业创新企业，融资难问题较一般传统企业更为突出。为此，必须加快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发挥金融创新对新经济的助推作用。鼓励金融机构针对新经济形态的企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扩大企业贷款抵质押品范围，灵活运用各类预期收益权、知识产权、专利权、股权质押等方式进行担保。加快完善信贷管理机制，鼓励商业银行加强与保险、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机构合作，支持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等新金融业态建立投贷联动机制，探索形成适合新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加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新经济形态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企业债券；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发展互联网金融等普惠性金融组织，发挥政府引导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各类风险投资基金支持新经济发展。

第六，加快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信息数据的公开与共享。着力破除信息孤岛，大力推进全社会信息数据的公开和共享，让重要的生产资料数据自由流动，实现对分散数据的有机整合和充分利用。深入推进政府信息资源公开、数据开放和共享应用，避免数据共享受制于一些政府部门的垄断；加快建立政府部门间互联互通的信息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扩大政府数据服务范围，满足新经济发展需求。推动实现数据资产化的统一管理。将既有的竖井式数据平台重构为云化的、开放的、分布式架构的大数据平台，为新经济的创新发展创造数据便利。加快推进大数据、云技术、超级宽带、

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工业互联网等各种信息技术设施的投资，弥补我国智能基础设施发展的“短板”。

第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大力实施知识产权和标准战略，强化无形资产保护。推动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盟，营造出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市场环境；加快完善质量监管体系，规范新经济发展的市场秩序；加强知识产权执法队伍建设，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快完善知识产权领域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环境。加快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全国一张网”，建立健全市场主体诚信档案、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对市场主体建立从“注册”到“注销”的全生命周期信用监管体系。尽快建立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联合激励与惩戒机制，开展信用联合惩戒，对失信者予以重罚，提高市场主体失信、违法犯罪的机会成本。

第八，加快完善网络安全体系建设，为新经济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底线。网络安全将是未来新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潜在风险，必须加快构建网络安全体系、强化网络安全保障。加强对相关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培训，真正提高其网络安全意识；政府要牵头推动实施网络安全技术的安全验证与提升，探索企业最佳商业模式；加快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充分体现网络安全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营造适宜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环境；探索政策支持方式，为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与人才培育创造条件；加强网络安全立法司法，切实保障网络安全。

第九，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理性预期，防范化解新经济发展中的泡沫风险。当前我国不管是新经济还是新生事物，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一方面要强化对发展新经济的舆论宣传引导，凝聚全社会对发展新经济的共识，促进形成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引导对新经济发展的理性预期，避免新经济野蛮生长出现泡沫。正确引导社会各界对新经济领域的投资，促进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行为的理性化，避免资本蜂拥而上助推的恶性竞争和泡沫滋长，注意防范新经济企业的估值泡沫风险；制定针对性措施规范互联网金融等新经济形态的发展方式，着力推动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防范新经济发展“脱实向虚”。

## 中国经济需要三个“新”<sup>①</sup>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5年经济工作。2015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而要全面实现经济健康

① 石建勋. 中国经济需要三个“新”【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12-09 (001).

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这两大目标，需要三个“新”，即：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造新优势、做出新贡献。

主动适应新常态，是在对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变化清醒认识后所作出的准确判断和战略选择。“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基于这一科学判断，一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中国经济总体向好，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

主动适应新常态，要求我们在布局明年经济工作时，既要看到经济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受经济减速、增长方式和动力转换、产业结构调整周期长和世界经济结构及产业分工重新调整等影响，过去的一些隐性矛盾将暴露出来。特别是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尤为突出，因此，经济工作“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相信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将会对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产生关键性作用。

主动适应新常态就要创造新优势。新常态意味着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塑造的中国经济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再靠以往大规模投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及外部需求，难以继续维持健康增长。政治局会议提出，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促进大众创业、大众创新，积极发现、培育新的增长点。这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到中高速过渡必然发生的生长动力切换，也是重要的战略部署。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加快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与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近30%，未来，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扩大内需为主的生长，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仅以城镇化为例，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大约能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城镇化发展释放的巨大投资和进口消费需求，将为世界各国提供广阔的市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将使全球产业结构更加优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方式将从依靠资源投入的粗放模式向依靠科技创新的模式转变，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全球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给拥有科技和服务业优势的世界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带来众多参与和合作的机会。

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坚持“稳中求进”，主动适应新常态，依靠改革创新和创造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着力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就是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大贡献。

## 新常态下锻造新优势<sup>①</sup>

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把转方式和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只有微观基础和产业基础不断改善，经济稳定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在结构优化调整中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在合理适当的增长速度区间内实现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不仅需要信心、决心，更需要高超的经济调控智慧和政策艺术，才能实现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着全面完成“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两大目标，提出了坚持稳中求进，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多项战略举措，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并切实加以贯彻实施。

### 一、主动适应新常态需要准确把握新常态

“新常态”是今年最热的词，也是这次会议主题词，准确把握新常态是做好2015年经济工作的前提。会议在对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趋势性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提出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战略性判断。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主动适应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是2015年工作的总基调。会议认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虽然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尤为突出，因此，会议提出“两个坚持”，即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这四个着力点重点突出、目标明确，体现了中央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决心和信心。

<sup>①</sup> 石建勋. 新常态下锻造新优势【N】. 文汇报, 2014-12-15 (005).

## 二、主动适应新常态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

主动适应新常态要创造新优势。新常态意味着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塑造的中国经济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再靠以往大规模投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及外贸需求拉动，难以继续维持健康增长。会议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促进大众创业、大众创新，积极发现并培育新的增长点。这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到中高速过渡必然发生的动力切换，也是重要的战略部署。

主动适应新常态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会议强调指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是一个矛盾的两面，增长不稳、经济下行压力大，调结构就缺乏基本前提条件，而结构调整缓慢，就难以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健康增长。只有经济保持一定增速，就业和民生才有保障，大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才能正常维持，才能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等中长期目标的实现。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把转方式和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只有微观基础和产业基础不断改善，经济稳定性也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在结构优化调整中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在合理适当的增长速度区间内实现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这就需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突出“三大重点”。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中的突出问题。会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一战略部署意在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由东向西梯度推进，既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和贫困差距，又能形成几大区域战略互动，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

推进“一带一路”，不仅是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力之举，广袤的中西部地区也受益匪浅，更具有国际战略意义，因为这一战略意味着我国大国外交将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同时区域协同和产业转型升级将加快。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建设中，中国将以资源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在沿线国家发展布局能源在外、资源在外、市场在外等“三头在外”的产业，进而带动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同时，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

## 三、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

全面完成2015年各项经济工作任务要靠推进改革。适应新常态的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归根结底是体制和机制障碍，最终都要通过改革去突破。2014年以来，行政审批、金融、财税、投融资、对外经贸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推进，既在稳增长上发力，又有效推动经济

转型、结构调整，为我国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强调“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要抓好改革措施落地，狠抓落实，强化责任”；“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为攻坚期如何向纵深推进改革作出具体部署，体现了中央强力促改革的决心。

## 7% 增速：有益中国，有益世界<sup>①</sup>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有人不禁要问，7%是不是偏低，这个增速够不够中国用？够不够世界用？

第一，7%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的实际状况。当前，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另一方面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压力较大。增长不稳、经济下行压力大，调结构就缺乏基本前提条件，而结构调整缓慢，就难以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健康增长。只有经济保持一定增速，就业和民生才有保障，大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才能正常维持，才能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等中长期目标的实现。

第二，7%是引领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标志性指标。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把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设为8%左右，最近几年主动调低为7.5%。目前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导向，有些地方的发展速度已经不慢了，还在追求增长目标的翻番。此次提出年增长7%目标，低于近些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不仅是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然过程。这不仅表明中国发展理念更趋冷静和理性，也彰显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引领中国经济实现从“量的增长”的旧常态向“质的增长”的新常态根本转变的决心、信心、意志和勇气。

第三，7%的增长目标与社会可承受能力相适应、与十八大确定的经济翻番目标相吻合。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如果设定再高些的目标，也有可能实现，但对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可承受压力增大，增长边际效果将明显递减，副作用增大。另外，由于前几年基数较高，未来几年只要维持6.7%的年增长率，即可实现2020年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

第四，7%的增长目标对世界的贡献不会减少。单纯从数量上看，中国经济体量和基数巨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世界贡献的增量也将成倍增加。未来，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扩大内需为主的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仅以城镇化

① 石建勋.7%增速：有益中国，有益世界【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03-06（001）.

为例，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约能带来 7 万亿元的市场需求，城镇化发展释放的巨大投资和进口消费需求，将为世界各国提供广阔的市场。

中国倡导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有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建设。中国倡导更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对亚洲经济体是合乎逻辑的“下一个”机会，不仅能够防止和抵御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还能够确保较小、较不富裕的国家同样受益。让伙伴受益，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惠及他方，这正是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对世界的新贡献，也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责任”。

## 新常态 新亮点 新举措<sup>①</sup>

**核心观点：**在经济运行困难比 2014 年增多、经济下行压力比 2014 年加大的复杂形势下，7% 的增长率与政府确定的 2015 年年度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吻合，依然处于合理区间，这实属不易，在全球范围内仍属“高速”。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中国经济正在平稳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不可逆转地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2015 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式进入“7 时代”，这是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标志性一年。第一季度的中国经济数据发布后，国际上唱衰中国经济的杂音再起，国内也有一些人士担忧中国经济或步入下行轨道。如何评价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这里从三个方面进行解析。

###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无论从理论和现实考察，还是从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的分析判断，中国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这是因为，一方面，新旧常态转换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传统的动力和新的动力正处在一种胶着的状态，这将导致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波动。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必然要面对的困难和问题。引人注目的是，2015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克服各种困难向世界交出了满意的答卷：经济增长率小幅回落至 7%，但较 2014 年第四季度增长了 1.35%。在

<sup>①</sup> 石建勋. 新常态 新亮点 新举措【N】. 文汇报, 2015-05-06 (005).

经济运行困难比去年增多、经济下行压力比 2014 年加大的复杂形势下，7% 的增长率与政府确定的年度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吻合，依然处于合理区间，这实属不易，在全球范围内仍属“高速”。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中国经济正在平稳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不可逆转地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 二、主动适应新常态，中国经济有新亮点

如果我们对新常态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增速降低”，那么无疑是在用旧思维看待新常态，容易忽略“增速降低”新常态的新亮点。

亮点之一是增长质量在提升。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升至 51.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 5.0% 和 1.3%；新登记注册企业数同比增长 38.4%；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1.3%；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一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 5.6%。这些数据说明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新动力正在加快孕育，经济增长的内涵和质量都在稳步提高。

亮点之二是民生和就业得到持续改善。虽然增速放缓，但衡量民众实际生活水准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数据，均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2015 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增 8.1%。就业方面，2014 年我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逆势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322 万人，同比多增 12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2015 年第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达 320 万人。

亮点之三是对外开放有新突破。“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规划与行动正式发布；“亚投行”朋友圈迅速扩大，57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超预期；上海自贸区扩容，新设天津、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中澳自贸协定结束实质性谈判，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取得新突破。这将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提供新动力、新机制。

亮点之四是资本市场持续活跃。2014 年下半年来，股市的繁荣不仅为企业融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刺激消费带来了活力。

## 三、全面深化改革，引领新常态有新举措

在坚定中国经济新常态光明未来信心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回避矛盾和问题。怎么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呢？

一是以深化改革释放经济活力。中央提出要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平衡，调动各方积极性，狠抓工作落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二是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央一再强调，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的关键。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经济发展“第一引擎”，努力让创新创业成为经济新动力“破茧

成蝶”的最佳手段。

三是适时启动政策工具箱稳增长。中央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及时进行预调、微调。

四是投资拉动要选好项目。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中央提出，要注重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认真选择好投资项目，做到有市场，有长期回报。一方面要增加有效投资；另一方面要化解过剩产能，新旧增长动力才能实现转换。

五是刺激消费要改善消费环境，挖掘消费潜力，提升消费水平。中央指出，要注重扩大消费需求，有针对性地挖掘消费潜力，努力提高消费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瞄准消费升级趋势性变化挖掘消费潜力，重在加强产业创新、降低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门槛。

## 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sup>①</sup>

根据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中央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即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提出了两个对外开放重大战略布局（即与周边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导设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简称“亚投行”）。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

### 一、“一带一路”打造新增长极

在中国经济新旧常态转换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以更高层次的经济国际化进程来拓展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空间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而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正是培育经济增长点，加快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调整的重大战略部署。其现实和长远的意义、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战略符合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不仅有益于中国产能和资本的输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而且可以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强劲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sup>①</sup> 石建勋. 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N】. 解放日报, 2015-06-09 (011).

第二，“一带一路”战略符合我国对外开放区域布局转型调整的需要，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对外开放的差距。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使命所在。“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是我国对外开放地理格局发生的重大调整，意味着我国大国经济将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同时区域协同和产业转型升级将加快，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带来西部地区产业的集聚。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向世界提供的互利共赢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

## 二、亚投行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巨额资金的持续支持和配套的国际投融资体系，在布局“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亚投行应运而生，并得到了普遍的欢迎。设立亚投行的意义和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最大的交汇点。从资金供给方面看，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平台，可以解决亚洲区域的资源错配问题，实现其储蓄和投资的有效配置，并在全球进行融资和投资，支持亚洲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基础设施发展，这也将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预期；从资金需求方面看，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大量引进外部资金，而这正是亚投行资金的用武之地。

第二，亚投行不仅将夯实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将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对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长期以来，亚洲地区的资本利用效率和金融活跃程度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金融话语权和主导权不强。亚投行的设立，不仅吸引了一批发达国家政府参与亚投行的投资，也将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国际资本和金融家们投资亚洲，这将进一步活跃亚洲金融市场，提升亚洲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第三，亚投行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有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由于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零和竞争的关系。亚投行成立将弥补现有世界金融体系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的缺口，并将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一方面能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也是对当前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在亚太地区的投融资与国际援助职能的有效补充。

## 三、上海应主动对接“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战略既非权宜之计，也非短时间可以实现，将贯穿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

全过程。在这一国家对外开放的长期战略格局中，上海有区位优势、国际中心城市的功能优势和集聚优势，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上海应该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在努力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使自身得到新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产生的金融创新需求对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充足的资金流，巨额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否适应和满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产生的需求，考验着上海的决策者、管理者 and 金融家。

第二，“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产生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需求对上海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上海能否顺利实现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能否建设成为科创中心、能否起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科技创新龙头和排头兵的示范作用，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创新产品，同样考验着上海的决策者、管理者、创新者和企业家。

第三，“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对上海建设国际枢纽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60余个国家和地区与上海的贸易额，只占到上海对外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上海与其中很多地区的贸易往来还是空白，说明上海与沿途国家和地区之间还有很多促进发展的空间。建设“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对上海来说也是一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契机。

第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对上海区域开放、区域协同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上海新一轮经济发展规划应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兄弟省、市、区，结合对口援建、协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工作，充分取得区域合作发展最大公约数，强化区域间规划衔接，在交通体系建设、产业布局配套、环境保护、人文交流、信息共享等方面，进一步发挥上海的优势，通过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管理输出等方式，建立与“一带一路”兄弟省、市、区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机制。

## 中国经济：韧性正在增强<sup>①</sup>

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式进入“7时代”，这是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标志性一年。

① 石建勋. 中国经济：韧性正在增强【J】. 中国报道，2015，(06)：44-45.

## 一、适应新常态有新作为、新亮点

从2014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呈现有序放缓态势，五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分别为7.4%，7.5%，7.3%，7.3%和7.0%，这是中国政府主动适应新常态、主动调低经济增速的结果。

增长质量在提升。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升至51.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5.0%和1.3%；新登记注册企业数同比增长38.4%；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1.3%；一季度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6%。这些数据说明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正在加快孕育，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转型升级势头良好，积极因素不断累积，经济增长的内涵和质量都在稳步提高。

民生和就业得到持续改善。虽然增速放缓，但衡量民众实际生活水准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数据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2015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增8.1%，跑赢7%的GDP增速。就业方面，2015年第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达320万人，城镇失业率在5.1%左右，总体稳定。

对外开放有新突破。《“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正式发布；亚投行“朋友圈”的迅速扩大；上海自贸区扩容，新设天津、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中澳自贸协定结束实质性谈判，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取得了新突破。这些都将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新动力、新机制。

资本市场持续活跃。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股市持续活跃，交易量屡创新高，指数不断攀升，企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股市的繁荣不仅为企业融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正能量，也为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刺激消费带来了活力。

## 二、引领新常态有新举措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现有的体制、机制不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变化，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以深化改革释放经济活力。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平衡，调动各方积极性，狠抓工作落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的稳定。

创新创业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经济发展第一引擎，加快推动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商业模式等发生趋势性变化，努力让创新创业成为经济新动力“破茧成蝶”的最佳手段。

目前，在物价水平低位运行的环境下，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箱”可选项有许多，但要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通道，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度，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要注重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认真选择好投资项目，做到有市场，有长期回报。一方面要增加有效投资；另一方面要化解过剩产能，新旧增长动力才能实现转换。

刺激消费要改善消费环境，挖掘消费潜力，提升消费水平，使消费引擎按新常态要求健康有序地发力。2015年第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0.8%，在“三驾马车”中对GDP贡献最大。要注重扩大消费需求，有针对性地挖掘消费潜力，努力提高消费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瞄准消费升级趋势性变化并挖掘消费潜力，加强产业创新、降低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门槛。

## 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惠及世界<sup>①</sup>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长期稳定的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有巨大的潜能、回旋余地、内在韧性，完全有条件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为世界经济提供广阔市场和坚实支撑。这是大国领袖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担当和自信，也是基于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实际运行状况和趋势的准确把握和判断。

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世界经济影响的因素，也有中国主动调控的因素，还有中国多年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的影响。

但即使这样，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依然达到7%，维持在合理区间，居于世界前列。它表明了中国经济实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走势。更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加快优化，服务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0%；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信息、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费需求旺盛，节能环保、绿色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加快形成。

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惠及世界。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由于全球贸易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近期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速放缓，但进口的大宗商品实物量非但未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未来，中国将在“优进优出”中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进口商品的数量还会更多。中国游客出境旅游的大规模购物，繁荣了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正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来源地。事实证明，中国不是世界经济风险之源，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增长，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

① 石建勋. 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惠及世界【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5-09-29 (001).

要推动力。仅以城镇化为例，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约能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其所释放的巨大投资和进口消费需求，将为世界各国提供广阔的市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将使全球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并给拥有科技和服务业优势的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带来众多合作的机会。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应。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中国也将继续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中国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将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有助于推进亚洲迈向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中国倡导设立亚投行、出资成立“丝路基金”，将促进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建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保持长期较高速度增长，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将进一步扩大全球总需求，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强劲动力。

## 中国经济新常态趋势分析及战略选择<sup>①</sup>

2015年4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只有深刻理解、统一认识，把握新常态演变发展的大逻辑和大趋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认识和判断上来，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一、新常态一词的来源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综述

作为近年来最热的经济术语，“新常态”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在2009年初提出的，其大意是：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体系不可能简单回归到危机之前，危机后消费群体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商业环境也在改变，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通缩将呈现长期化、常态化。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意见认为，经济停滞将可能成为新常态。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陆续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将步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的新常态。石建

<sup>①</sup> 石建勋,张悦.中国经济新常态趋势分析及战略选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4):1-7.

勋认为，由于未来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资源品价格的上升以及国内土地可供面积的逐年减少导致地价上升等因素，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已经过去，外贸增长将进入瓶颈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降低，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等持续增加，将使未来中国经济呈现“适度增长、中度通胀并存”的格局，8%~9%的增长或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甚至不排除经济增长在7%~9%。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具备若干特征：第一，经济增长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如7%左右；第二，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带动；第三，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第四，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第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第六，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剧锦文认为，新常态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包括经济增速的放缓和经济质量的提升两个内涵。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模式的转变，将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技术进步等效率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最高决策层首次使用“新常态”一词来描述中国经济，这是在对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变化的清醒认识上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变化。2014年7月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提“新常态”，2014年11月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2014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更加系统和具体的阐述，标志着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基本形成。

##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及逻辑演绎分析

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的表述有很多，最新的权威概括是2015年4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的趋势性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五个主要特征：①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②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③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④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⑤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显而易见，新常态特征还是趋势性特征。

中国经济新旧常态的转换是按照以下逻辑展开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

物资极度匮乏，百姓温饱不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摆脱贫穷，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运用各种手段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加快发展是当时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由于体量和基数变大，中国经济增速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在保就业、惠民生方面的效应也明显增大。同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也成倍增加。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全球总需求不振，外贸低成本比较优势削弱；传统产业严重产能过剩；生产要素的规模驱动力趋减；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各类隐性风险随经济增速下调显性化；全面刺激政策边际效应明显递减等。中国经济既“做不到”也“受不了”像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至少要持续10年以上，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两年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常态的逻辑关系分析

####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产物或必然反映

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对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条件变化进行逻辑分析。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未来不确定性增加，这是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基本认识。但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考察分析，可以发现，今天看似不相关的事件，都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也都有其产生、演变及发展的规律和清晰的逻辑轨迹可循，深刻解析这些内在联系和逻辑轨迹，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当今世界发生的事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和把握未来世界经济新常态的演变发展趋势，从而对世界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一个历史逻辑上的科学认识和把握。

虽然美国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多年了，其负面影响和持续效应并未完全消除。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2008年的危机，我们发现，危机之前的近20年，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其间，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比较平稳，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更是高速发展了二十多年。在拉美地区，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之

后，各国经济也真正得到恢复和发展。非洲地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经济增长速度也令世人瞩目。

长期繁荣之后，长期的衰退接踵而来。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打破了世界各国快速发展的美梦，其负面影响和持续效应仍然在发酵：其一，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源，即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严重扭曲等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其二，在救助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相继推出了超常规的刺激经济措施，在防止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过度的货币供应、政府举债救市、市场流动性泛滥以及社会动荡和政府危机愈演愈烈；其三，危机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美国债务危机和美元信用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危机、欧元及欧债危机仍然有可能在某个时点，或因为某个事件再次引爆局部或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 （二）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趋势性特征

一是经济危机导致原有全球分工体系和增长模式破坏，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方式，国际分工体系和增长方式将被重构。二是当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和常态化，世界经济将持续呈现低速“弱增长”格局。在低速“弱增长”中转型，在转型中“弱增长”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三是世界各国为应对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将围绕着国家自然禀赋有效利用以及国家对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展开博弈，导致资源纠纷、领土纠纷和国家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这将成为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发展的新常态。四是为应对自然生态环境危机，世界各国对新能源、新材料、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将引发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消费革命和社会变革等。五是世界进入了金融化生存竞争时代，在世界经济转型调整过程中，金融货币手段越来越多地成为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维护其经济与金融霸权的常态化手段。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危机后的世界各国经济可能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大规模、高强度的刺激经济政策不断推出，现阶段的“危机后遗症”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的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稳定、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全球经济进入了一种非理想化的新常态。

## （三）国际经济关系视角下的世界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

趋势性特征有：第一，国际关系平等化；第二，国际经济格局多元化；第三，国家货币金融体系多元化；第四，国际分工合作的合理化、均衡化；第五，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民主化；第六，国际经济增长的多级化、非均衡化。从国际关系演变发展的视角来看，埃里安提出的新常态对美国而言是非常痛苦的新常态。因为这个新常态意味着美国逐渐丧失全球化主导权，失去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机”地位，美元霸权地位动摇，其

世界银行的角色面临破产，所以，迄今为止美国官方不承认也不接受使用新常态。

#### （四）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对世界的意义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这一国际场合讲述中国经济新常态，既彰显了中国基本面貌的积极变化，也揭示了中国决策层直面困难的决心。新常态下，亚太各经济体用新思维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打破壁垒减少摩擦，实现亚太大家庭的繁荣。中国倡导的更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对亚洲经济体是合乎逻辑的“下一个”机会，不仅能够防止和抵御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还能够确保较小、较不富裕的国家同样受益。

作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中国经济维持稳定与增长，就是对地区经济的重要贡献。尽管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7.4%，但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不减反升。据IMF测算，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超过美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对亚洲而言，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将带动亚洲经济增长0.3%。仅以城镇化为例，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约能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城镇化发展释放的巨大投资和进口消费需求，将为世界各国提供广阔的市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将使全球产业结构更加优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方式将从依靠资源投入的粗放模式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模式转变，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全球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给拥有科技和服务业优势的世界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带来众多参与和合作的机会。

### 四、中国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无论从理论和现实考察，还是从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的分析判断，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描述的新常态五大特征只是一种趋势性的理想状态，还不是已经实现或已达到的现实状态。这是因为，一方面，新旧常态转换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那些旧常态的受益者、旧常态的习惯者都不可能自愿接受新常态，观念滞后、行动滞后以及为维护旧常态下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排斥新常态将使得新旧常态的转换是一个复杂、长期、痛苦的过程。从国际上看，世界走向新常态的过程是国家间不断争斗和博弈的过程，旧常态的引领者和受益者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和美元不会自动退出霸权地位。维护或恢复美国和美元霸权的旧常态，获取霸权收益是美国一贯的国策，不可能轻易改变。从国内看，对增长率的崇拜和热衷于大拆大建的旧习惯，短期内也难以根本改变，旧常态的引领者和受益者也不会自愿放弃旧常态下的既得利益。在“旧常态”和新常态的博弈中有许多不确定性，有反复、有矛盾、有冲突在所难免。从国际上看，平等、民主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开放公平互利的国际贸易新机制等新常态都需要健康的力量去争取与引领。从国内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传统的动力和新的动力正处在一种胶着的状态，传统动力

的体量还是比较大，新的动力虽然代表新经济的发展方向，增长速度比较快，但体量还比较小。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这将导致未来3~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保持定力，继续加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同时也要进行适度的调整，引领中国经济尽快进入增长稳定、结构优化、环境改善、民生福利提高的新常态，力争把经济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为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稳定的环境。

## 五、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选择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充分体现。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人类不能改变客观规律，只能主动学习和适应，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就是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基础，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我们的各项工作计划更有预见性、科学性，而不是被动适应被动应付新常态的各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不仅需要“新认识”，更需要主动适应新常态的“新心态”“新观念”和“新举措”。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任务都有了变化，就应该顺势应变，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革创新，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经济新常态。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如何有效缓解和化解这一特殊阶段的矛盾和风险，保持中国经济在新常态条件下的稳定运行，不仅是经济界、理论界的一个新课题，更是中国经济的每一个参与者必须主动面对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

### （一）主动适应新常态要创造新优势

新常态意味着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塑造的中国经济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再靠以往大规模投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及外贸需求拉动，将难以继续维持健康增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积极发现并培育新增长点。这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到中高速过渡必然发生的增长动力切换，也是重要的战略部署。

### （二）主动适应新常态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是一个矛盾的两方面，增长不稳、经济下行压力大，调结构就会缺乏基本的前提条件，而结构调整缓慢，就难以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健康增长。只有经济保持一定增速，就业和民生才

有保障，大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才能正常维持，才能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等中长期目标的实现。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把转方式和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只有微观基础和产业基础不断改善，经济稳定性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实现。

### （三）主动适应新常态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突出“三大重点”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一战略部署旨在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由东向西梯度推进，既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和贫困差距，又能形成几大区域战略互动，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推进“一带一路”，不仅是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力之举，也具有国际战略意义，因为这一战略意味着我国大国外交将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建设中，中国将以资源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在沿线国家发展布局“能源在外”“资源在外”“市场在外”等“三头在外”的产业，进而带动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同时，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

### （四）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主要靠推进改革

适应新常态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归根结底是体制和机制障碍，最终都要通过改革去突破。2014年年初以来，行政审批、金融、财税、投融资、对外经贸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推进，既在稳增长上发力，又有效地推动了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为我国长远发展打下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要抓好改革措施落地，狠抓落实，强化责任”“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为攻坚期如何向纵深推进改革作出具体部署。

### （五）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应当是中国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的主基调

“十三五”期间，引领中国经济步入理想中的新常态，顺利实现旧常态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需要更加重视和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是深刻总结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也是主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有效化解当前和未来“三期叠加”困局的必然选择。

## 唱衰、做空中国？笑话！<sup>①</sup>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唱衰中国的声音几乎不曾停息，但最终总会被证伪。

这些论调的一大缺陷在于，过度夸大和渲染一些暂时性问题，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来预测中国即将发生危机。面对非议，中国有定力、有自信。中国了解自己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现状需要放在中国主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增长率，持续时间长达30余年。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以及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国内环境资源供给约束趋紧，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就成了当前乃至今后较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把中国经济的主动降速作为唱衰中国的主要理由，实在是牵强附会。

2015年的经济数据显示，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实现了6.9%的增长，同时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增长均高于经济增速，环境持续得到改善，经济结构更优化；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60%以上，需求结构持续改善；恩格尔系数从2014年的31%进一步下降到2015年的30.6%，居民消费结构也在优化。这表示，中国经济“含金量”在提升，正在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中国经济已站上了新起点，中国发展正迈向新高度。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当前确实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问题，但这些风险都在可控范围，这些问题都有办法解决。面对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国内的深层次矛盾，中国既坚定信心又正视困难，通过综合施策，运用好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完全有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展望未来，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改变，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改变，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没有改变。未来，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的“动力源”。

<sup>①</sup> 石建勋. 唱衰、做空中国？笑话！【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1-30（001）.

## 经济增长目标 6.5% ~ 7%，如何看？<sup>①</sup>

2016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是6.5%~7%，这标志着我国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划定了明确区间。这个区间目标有何新意？这个目标对中国来说够不够？对世界来说够不够？

首先，6.5%~7%的增长区间目标，符合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未来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就要达到6.5%的水平。所以，设定6.5%的经济增速作为区间目标下限，即最低速度，是完成“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

其次，6.5%~7%的增长区间目标，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表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6.5%~7%，考虑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考虑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业、惠民生，有6.5%~7%的增速就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这里的“需要”，就是改善民生和就业，对保持一定增长速度有客观要求。这里的“可能”，就是资源环境条件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约束。因此，设定7%的增长上限，无论是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需要，还是从当前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政策目标的要求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

再次，6.5%~7%的增长区间目标，为中国政府调控经济提供了灵活的空间。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年。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改变，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改变，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当前确实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问题，经济在向新常态转化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国际经济和金融格局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国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确定性增加。在这种环境条件下，设定一个经济增长的区间目标，为中国政府调控经济提供了灵活的空间，有利于提高中国政府在多重约束条件下，采取更加灵活、精准、有效、及时的调控政策，实现保增长、促就业、改善民生和控通胀、防风险、调结构、护环境等的平衡。

最后，6.5%~7%的增长区间目标，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会减少。以绝对增量计算，中国经济体量和基数巨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世界经济贡献的增量也将成倍增加。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名列前茅。正如《日经亚洲评论》称，

<sup>①</sup> 石建勋. 经济增长目标 6.5% ~ 7%，如何看？【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3-06（001）.

中国政府将 2016 年的 GDP 增长目标设定在 6.5% ~ 7%，这一高位区间或许可以让低迷的全球市场松一口气。中国经济在 2016 年两会释放的积极信号，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心剂”。

## “区间调控的新方式”新在哪儿<sup>①</sup>

基于“合理区间”的宏观调控跳出了经济本身，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全盘考虑，这表明中国政府正在以新的思路和方式追求健康、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在复杂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设定一个经济增长的区间目标，有利于提高中国政府在多重约束条件下，采取更加灵活、精准、有效、及时的调控政策，使经济获得可持续的平衡增长。

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上指出：“几年来，我们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提出区间调控的新方式，把稳物价作为上限，把保就业作为下限。这一区间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这种经济增长的区间目标设定和区间调控的新方式新在哪里？如何解读后续的一些经济调控和改革政策？

### 6.5% ~ 7% 增长区间立足现实兼顾长远

首先，6.5% 的增长目标下限符合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目标”和“要求”。要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现比 2010 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就要达到 6.5% 的水平，所以，设定 6.5% 的经济增速作为区间目标下限，是完成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同时，如果经济增长低于 6.5%，就业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就很难完成，因此，2016 年经济调控的底线就是保证经济不低于 6.5% 的增长率，防止经济失速或硬着陆。一旦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政府将会果断采取综合性措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证就业和民生改善任务的完成。

其次，7% 的增长目标上限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这里的“需要”就是改善民生和就业对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客观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和失业率之间有一个稳定关联，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失业率相对越高。这里的“可能”就是资源环境条件和控制通货膨胀政策目标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约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通货膨胀率就可能提高，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可承受压力增大，增长边际效果将明显递减，副作用增大。因此，设定 7% 的增长上限，无论是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需要，还是从当前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目标的要求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

<sup>①</sup> 石建勋.“区间调控的新方式”新在哪儿【N】.文汇报,2016-03-31(005).

### 新“速度档位”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增长区间目标增加了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弹性空间。经济增长 6.5% ~ 7% 合理区间的提出,说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开始明晰,已基本找到了新的“速度档位”。这是中国政府在 2015 年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创新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是对以前经验总结、认识深化的结果,说明中国政府在经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在宏观调控中表现得更加成熟,有了更强的定力和信心。以“合理区间”为基础的新型宏观调控思路将对中国的改革攻坚和经济转型进程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合理区间”的宏观调控跳出了经济本身,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全盘考虑,这表明中国政府正在以新的思路和方式追求健康、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

### 推进供给侧改革就是牵住“牛鼻子”

增长区间目标调控,关键在改革,重点是供给侧改革。中国 30 多年快速发展的经验证明,只要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就会持续前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合理区间”宏观调控的“衣领子”和“牛鼻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打好这场硬仗,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落实到位,将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好加法和减法的关系,就是要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就是既解决当前问题,又为长远谋划;把握好力度和节奏的关系,就是既控制好改革进程,又考虑各地实际和承受力;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就是既适度扩大总需求,又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作为主攻方向;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手抓结构性改革,一手补齐民生短板,才能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才能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运行在“合理区间”。

## 两会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心<sup>①</sup>

中国的两会,向来是海外媒体洞察中国的绝佳窗口。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部长答问、代表和委员们提出的议案提案、大会上热议的发展规划等释放出的信息,都在清晰地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声音”“中国信心”和“中国正能量”。

两会向世界传递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信心。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国内生产

① 石建勋.两会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心【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3-15(001).

总值增长预期目标 6.5% ~ 7%，获得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好评。路透社认为，虽然 6.5% 的底线相对于之前 30 多年的实际增速是低点，但这一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凸显了在经济下行压力仍大的背景下，中国为宏观调控预留空间和引导市场预期的良苦用心。《华尔街日报》刊文说，这一目标高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向全世界释放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信息。彭博社称，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部长、人民银行行长关于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论述，平息了全球对于中国经济下滑的担心，让全球市场对中国经济信心大增。

外界对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信心来自何处？其来自于中国内外政策的稳定性、中国政府超常的战略定力和卓越的执行力；来自于深化改革的坚实推进和经济转型的重要进展、政府和民众直面困难的坦诚和勇气；来自于中国政府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决心、信心和完备的对策方案。

两会向世界传递中国稳定汇率、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一行三会”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表示将加强金融监管，采取有效措施维护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稳定。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一些发达经济体国家继续实施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的环境下，中国稳定汇率、稳定金融市场的表态无疑有利于恢复市场信心，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向世界传递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决心和诚心。“十三五”规划不仅从战略高度谋划了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布局，明确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还安排部署了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政策措施。有境外媒体称，当一些西方政治家们正热衷于制定或实现个人竞选计划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则在集中精力全面制定国家的五年发展规划。“十三五”时期无疑是中国复兴道路上的重要历史阶段。

“十三五”规划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活力，也将向世界源源不断地传递着来自中国的正能量。

## 达沃斯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心<sup>①</sup>

2016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召开，来自 9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0 多位嘉宾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主题展开讨论，从“重设体系、重塑增长、反思创新”3 个维度，

① 石建勋. 达沃斯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心【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6-06-29 (001).

探讨工业4.0的新蓝图。近期以来，中国向世界清晰地传递了“中国信心”“中国经验”和“中国建议”。

首先，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得益于改革创新和调整转型取得新进展。2016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来之不易。新增市场主体平均每天4万户，2016年1—5月的增长速度高于推进这方面改革的前两年；另外，就业保持稳定，1—5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577万人，完成2016年目标任务的58%。

中国高度重视创新发展，这与201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非常契合。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近年来，中国的新技术、新业态、新经济都在快速增长，高端制造业、电子商务、现代服务业等一些转型升级的产业也在快速发展。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正在步入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动能不断积蓄的新发展阶段。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涉及的主要领域，全世界都期待中国发挥关键作用。”

其次，结构性改革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出路。无论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积极实施结构性改革。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既要加强需求管理，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以消除“病灶”。

西方陷入金融危机以来，为刺激经济走出衰退泥潭，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竞争性地轮番采取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都试图依赖简单的需求侧刺激来复苏经济，在结构性改革方面进展都不大。从多年来的国际实践看，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操作，绕开结构性改革的苦药，这种治疗方法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健康复苏。相反，只能造成更多的资产泡沫、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式的长期停滞。

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主动采取行动去产能，这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去产能本身就表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着力推进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可能会使经济增长速度稍微慢一点，但长远看，调整成功后，会对世界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以公平竞争为特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离不开高效有序的全球治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少数发达国家采取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建立封闭性贸易组织、实行单方面制裁、使用各种限制性机制在内的经济杠杆等使全球经济空间碎片化的举措，严重损害了世界贸易组织普遍原则，对国际经济关系体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

当前乃至今后很长时期，各国面临共同的挑战，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充分考虑政策外溢性影响，坚定不移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正常运转，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致力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才能顺利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

## “1+6”圆桌会释放哪些信号<sup>①</sup>

2016年7月22日，世界六大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齐聚北京，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了“1+6”圆桌对话会，共商国际经济大势和应对之策。他们分别是：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赖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

这个“1+6”圆桌对话会，对中国和全球来说，都属首次。对话成功举行并达成了8点共识。这次对话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第一，体现了中国充分尊重和支持国际组织的工作。这六大世界主要经济金融机构，是“二战”后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是现有国际经济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与会的国际组织领导人认为，中国是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伙伴、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作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发挥了重要领导力。“1+6”圆桌对话会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经济组织工作的尊重和支持。多年来，中国虚心听取国际经济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坚定不移地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正常运转，积极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运行，积极推进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生活改善等，体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

第二，国际经济组织对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认识到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同时，各大国际经济金融机构高度认可和肯定了中国经济上半年取得的“成绩单”。在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的背景下，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经济结构更加优化，消费和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等一些大型经济体劳动力市场情况好于其他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却调高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是看好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取向及成效。

第三，达成的共识有助于增强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面对世界经济复苏的难题，与会各方开出了“药方”。诸如，需要采取有力的、综合的、协调的，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各种政策工具，以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应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财政政策应保持灵活性，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信心，并确保可持续性，还应致力于支持结构性改革和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等。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圆桌对话会上所指出的：“本次对话是在世界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刻举行的重要会议，也是中国政府同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之间一次具有开创性的集体对话，表明中国愿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它的积极意义，将很快得到验证。

<sup>①</sup> 石建勋.“1+6”圆桌会释放哪些信号【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7-25(001).

## 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有底气<sup>①</sup>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在 6.5% ~ 7% 的合理区间运行。

2016 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判断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晰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十三五”规划建议作说明时指出，2016—2020 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 6.5% 以上。他还多次强调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在 2015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加强政策落实，把我们的战略定力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信心通过稳定的政策传导给全社会。

中国有能力、有信心长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也许有人要问，保持 6.5% ~ 7% 的中高速增长的定力和信心来自哪里？

首先，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中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积极性、创造力和智慧，进一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创新创业、消费和投资的积极性，是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基础。因此，我们应健全市场法制体系，把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放在各级政府工作的首位，加大保护消费者、中小投资者力度，不断增加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品质生活的需要。

其次，来自中国经济基本面企稳向好的大势。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着不少困难和下行压力，也有许多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但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改变，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改变，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没有改变，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16 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实现了经济发展、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较好开局。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显示，经济短周期筑底企稳基本确立，说明了中国的基本面正在企稳向好。

最后，来自中国政府日渐娴熟的宏观调控手段和经济管理方法。近年来，中国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提出区间调控的新方式，把稳物价作为上限，把保就业作为下限，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区间调控思路的提出说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已经比较明晰，基本找到了新的“速度档位”。中国政府在经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在宏观调控中表现得更加成熟，完全有能力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抓住了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衣领子”和“牛鼻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打好这场硬仗，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落实到位，将推动“十三五”时期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提升。一手抓结构性改革，一手抓补齐民生短板，就一定

<sup>①</sup> 石建勋. 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有底气【N】. 中国经济导报, 2016-05-20 (B02).

能够使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运行在合理区间。

## 正确理解中国经济的 L 型走势<sup>①</sup>

中国经济 L 型和西方的 L 型根本不同。西方的 L 型是经济断崖式下跌后长期低迷滞胀、不复苏。中国经济显然不是滞胀问题，2016 年第一季度增速达 6.7%，好于预期，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经济 L 型只是转型升级，未来将会带来更高质量的增长，因此这种长期预期和西方经济的长期低迷完全不同。

近段时间，有关未来中国经济 L 型走势的预判，引起了热议。应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经济 L 型走势呢？

### 一、L 型走势预判与“十三五”增长目标一致

用诸如 U 型、V 型、L 型，还有 L+W 型等形象地比喻经济运行趋势，是国际上一些学者和记者常用的方法。用字母形象地比喻经济走势，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仅对 L 型就有很多解读，包括不断下降的多个 L 型、没有底部的小写的 l 型等，如果不辅以数字和文字说明，就容易引起误解和误判。事实上，所谓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 L 型走势，实际上就是指“十三五”规划确定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 6.5% ~ 7% 的合理区间内运行。如果未来五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都在这个区间运行，就会形成一个长达 5 年的倒 L 型直线走势，这样，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此前权威人士所说的 L 型走势的长期性了。

习近平总书记就“十三五”规划建议时指出，年均增长底线是 6.5% 以上。2016 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判断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晰了。中国经济 L 型走势意味着未来经济将在 6.5% ~ 7% 的合理区间平稳增长，既不会出现强劲反弹，也不会出现明显降速。这样的增长区间目标正好符合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目标和要求”“需要和可能”。“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2020 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实现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未来 5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就要达到 6.5% 的水平。而设定 7% 的增长上限，就是防止经济过热，无论是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需要，还是从当前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政策目标的要求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

<sup>①</sup> 石建勋，王盼盼. 正确理解中国经济的 L 型走势【N】. 文汇报，2016-06-14（005）.

## 二、L 型走势意味着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跃升

L 型走势标志着我国经济运行多年积累的“病症”已进入治疗阶段，因为 L 型走势一方面保持就业稳定和人民生活改善所必需的经济增速，也可以使企业有足够的财力进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又给企业形成一定的压力，倒逼企业苦练内功，努力完成“三去一降一补”，加快适应经济新常态，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同时，经济运行保持在 6.5% ~ 7% 合理区间的 L 型走势，也为中国政府调控经济提供了灵活空间。在当前复杂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经济增长 6.5% ~ 7% 的区间调控新方式的提出，有利于中国政府在多重约束条件下，采取更加灵活、精准、有效、及时的调控政策，使经济获得可持续的平衡增长。基于“合理区间”的宏观调控跳出了经济本身，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全盘考虑，这表明中国政府正在以新的思路和方式追求健康、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在经济 L 型走势的背景下，以“合理区间”为基础的新型宏观调控思路将对中国的改革攻坚和经济转型进程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如果在 L 型走势下，全面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质量、效率和效益的同步跃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无疑都是一件大好事。

## 三、L 型增长对应的股市走势或许是“慢牛”格局

不可否认，股市趋势与经济运行确实存在一定的紧密联系，但不能简单地认为若经济呈 L 型走势，股市的走势也必定是 L 型。以美国为例，1985—2015 年期间，美国的经济 L 型走势持续了 30 年，而同期美国股市却出现了 24 年的上涨，道琼斯指数从 1 211.56 点涨至 17 425.03 点，呈现出一个典型的长期慢牛行情。再看中国，我国经济在 1997—2001 年的转型期也是慢牛格局，在 2012—2015 年中期，我国经济呈 L 型走势，但股市也并非都是熊市。这些事实表明：经济运行趋势并不一定能完全左右股市走势。

就当前形势而言，我国经济 L 型增长对应的股市走势或许是“慢牛”格局。从基本面来看，经济 L 型增长下，随着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将逐步改善。对存量经济来说，需求端稳定而供给端收缩，盈利将会逐步进入恢复期；对增量经济来说，盈利本身就处于高增长阶段。

此外，在经济 L 型增长趋势下，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将对股市构成一定的支持。就股市自身而言，中国股市从来就不缺资金，缺的是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和执行力，希望并相信经济 L 型走势下的中国股市，将进一步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真正恢复股市的投资回报功能、企业融资功能和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进而建立一个健康、稳定、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成熟资本市场。

## 把握稳中求进的新内涵、新举措<sup>①</sup>

**核心观点：**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多边主义和推进全球化，努力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对中国自身，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都将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健康发展具有全球意义。

梳理近年来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可以发现，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已延续4年，这既有一脉相承的定力与坚守，也有与时俱进的创新与突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指导2016年经济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一、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

2016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的势头。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提升，经济结构继续优化，2016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到7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至52.8%，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新增城镇就业1067万人，服务业增速快于工业增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增长新动力加速培育。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一带一路”的影响力愈发广泛，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更加自信和卓有成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中国经济新格局正在形成。

2016年取得的成绩已成为历史，2017年面临的形势和环境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全球经济贸易依旧持续低迷，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加剧将恶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国内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仍然突出，一些领域金融风险显现，部分地区和行业困难较大。全面深化改革已到深水区，涉及很多重大利益调整，改革难度加大。把握好“稳”和“进”的关系，对于顺利推进各方面改革至关重要。面对各种困难、挑战和压力，要完成2017年改革与发展的艰巨任务，不仅要有攻坚克难的勇气、决心、定力和自信，也要有攻坚克难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改革新举措。

2017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就是要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市场预期稳定、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下，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攻坚克难，推进关键领域工作取得新突破。

<sup>①</sup> 石建勋. 把握稳中求进的新内涵、新举措【N】. 文汇报, 2016-12-21 (005).

## 二、在稳的前提下有所进取

首先，经济政策既有“稳”也有“进”。当前经济缓中趋稳，但不宜过于乐观，稳增长的经济政策仍要保持力度，与稳中有进的总基调相匹配，以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合理流动性规模，防范金融体系风险。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稳”主要是稳预期、稳增长，“进”是在稳定的政策总框架下，采用灵活、渐进的方式，注重微调手段，把控精准指向，既有利于政策保持连续性，又可以让市场主体在慢慢改变行为惯性之中，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质量效益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其次，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稳增长既是改革的目的，也是改革的基础，没有稳定的增长，改革就会失去有利的实施条件，从长远来看，稳定经济增长、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要靠深化改革。2017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破解发展难题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特点在于“深化”，改革本质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会议提出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的实质性进展，特别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完善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加强对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的推进，相信这些深化改革举措的实施，将筑牢稳中求进的长期根基。

再次，要补上民间投资这块短板，振兴实体经济。民间投资是全社会投资的主体和主力。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是制造业，关键在于激发民间投资的热情，核心是创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着力防控资产泡沫；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要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将有效稳定民营企业信心，激励民间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总之，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多边主义和推进全球化、努力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对中国自身，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将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 第二部分

# 金融改革发展新趋势

## 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的战略取向<sup>①</sup>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而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能否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能否在促进经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换中发挥金融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对于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亟待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尽快形成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金融新结构、新机制。

### 一、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的重难点和风险

虽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金融改革的内容并不多，一共才 382 个字，但笔者认为金融改革可能是改革 60 条中最难的改革之一，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金融改革首先要涉及金融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之难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金融是计划经济遗留的最后一个价格管控领域，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几乎所有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价格，都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唯一价格还受政府管制的就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率”和“汇率”价格一直没有放开，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也没放开。问题在于，“利率”和“汇率”价格如何实现市场化定价，改革程度应该有多深，企业承受能力在哪里，金融市场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市场化改革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和难度之大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期。

金融领域的价格改革以及资本账户开放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金融风险，若不能有效避免和化解金融风险，就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生活资料价格改革引起了抢购风潮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也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新一轮金融价格改革要汲取历史教训，积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第二，金融改革要突破现有金融利益格局，遇到的抵触和阻力可能远超预期。如果说 30 多年前邓小平主导改革的目的是和动机是为了“做蛋糕”，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尽快把蛋糕做大，因此有了著名的“猫论”和“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当时整个中国物资极其匮乏、大家普遍都很穷的环境下，还没有既得利益集团，而旨在把蛋糕做大、提高效率的改革容易获得普遍的支持。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的今天，物质极

<sup>①</sup> 石建勋. 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的战略取向【J】. 探索与争鸣, 2015, (02):65-68.

大的丰富，但贫富差距过大，因此，新一轮改革的目的是和动机更多的是如何“分蛋糕”，考虑更多的是追求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会削减许多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改革遇到抵触和阻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任何制度改革都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都会让一些人或集团获益，而让另外一些人或集团的利益受损。金融市场制度改革中谁受益、谁受损，则成了金融改革制度设计的关键。在现有的改革框架下，既得利益者往往是政策制定的主导者，容易把利益制度化与合法化，可能导致改革与市场法则相去甚远。当前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难题是：敢不敢、愿不愿意从根本上打破利益固化的制度安排，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来彻底规避和防范新的利益固化的形成？敢不敢承担金融改革可能面临的风险？

第三，金融改革面临着不少“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选择困境。金融领域内外相关要素的外溢性、传导性和关联度极高，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是先开放资本账户，还是先扎好篱笆练好内功；是先进行利率改革，还是先进行汇率改革；是先取消管制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再进行市场化改革，还是先进行市场化改革，再降低门槛；是先进行增量方面的改革，还是存量和增量一起改革；是先推进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再推进国内金融改革，还是先搞好国内改革再推进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改革等。而其中最难的是金融机构和“僵尸”企业如何顺利实现退出的市场化。这主要是因为：在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经营和竞争中，总会有金融机构因经营管理失败而退出市场，特别是在市场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会有更多企业和金融机构面临生存的困境与危机从而退出市场。难题就在于：既要让高风险或危机的金融机构及时顺畅地退出市场，解决金融机构经营失败而不倒，发生危机而不死，真正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最大限度地强化市场纪律约束；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和纳税人的权益，保持金融业务与服务的连续性，有效防止发生金融挤兑风潮和金融系统性风险，确保金融体系和社会的稳定。

## 二、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的原因

虽然金融改革面临的难度和风险非常大，但是不改革更没有出路。在过去旧常态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市场主体行为很难及时做出调整，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市场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的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收缩而破灭，地方的土地财政模式也可能难以为继。若金融改革措施不到位，调控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如何通过财政金融改革，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并逐步化解，同时又避免产生新的风险累积，将成为新常态下加快金融改革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仍然是个“金融小国”，以金融改革促金

融大国建设“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中国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是世界第一，国际收支上双顺差的延续使我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但我们仍然是一个“金融小国”，金融实力和影响力与经济实力很不相称，呈现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贸易大国、货币小国、金融小国”的失衡状况。突出表现在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国际化，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主要使用美元，交易成本高且受制于人，中国的金融话语权与经济大国地位不相称，金融的定价权缺失，目前无法轻易改变自己的汇率制度和利率刚性。贸易大国所带来的过剩的流动性问题，制约着我们在这一失衡结构中的经济增长，也使央行宏观调控政策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金融小国”容易受制于人，不得不忍受着被世界货币大国剥削和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其为摆脱危机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导致“金融小国”痛苦地承担着热钱流入套利、输入性通胀、出口成本增加等美元持续贬值的负面效应。而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开始实施退出货币宽松政策，“金融小国”的货币普遍受到美元强劲升值的挑战，套利热钱大规模流出，导致这些国家的市场出现急剧动荡，经济与金融体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和冲击。“金融小国”的不利地位，迫切需要我们加快金融改革，构建金融大国和强国。

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虚拟化趋势加快，以金融改革促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已迫在眉睫。据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第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我国的货币存量已经是美国的1.38倍，如果换算成同等经济规模，我国的货币存量大约是美国的2.5倍。货币超发是最近十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持续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巨量货币；另一方面又到处喊缺钱。钱都去哪儿了？关键原因在于：大量信贷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并未真正进入实体经济，这就造成金融体系资金过剩，实体经济却资金难求。一些商业银行纷纷通过贷款转让、票据融资、滚动签发承兑汇票等方式绕开银监会的存贷比考核，为争取下一个年度的信贷额度，在季末和年终突击放款、虚增存款。2009年和2010年两年的18.3万亿元的信贷中，大约有4.5万亿元的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即使经过几年的政策调控，目前仍有至少2万亿元的资金游荡在实体经济之外。此外，以股票、投资性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配置增长较快，并成为社会资金的重要投资领域。实体经济回报率越来越低，大量资金囤积在投机领域，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通过加快金融改革，完善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实力和能力。

市场定价机制不完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结构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以金融改革促金融资源公平合理有效的配置已迫在眉睫。制度缺陷导致金融市场出现了不公平竞争，金融体系资源配置失灵，资源向上市公司、国有大企业和金融机构集中，而广大中小企业金融资源紧张，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缺失。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近年来管理层针对证券市场改革施政的重点方向，然而，无论从新股发行还是从“僵尸”企业退市来看，现行制度仍存在诸多漏洞和弊端，这也使财务造假事件屡禁不止，让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投资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 三、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机遇及战略目标

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与发展面临下列战略机遇。

(1) 全面深化改革为金融改革提供了整体推进和配套改革的机遇。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化改革是金融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一次重大历史机遇，金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着力点。一方面，金融改革要为推进其他各项改革服务；另一方面，其他各项改革也为加快推进金融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这为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综合配套和整体推进的战略机遇。金融改革既要主动出击，也要借力而为、顺势而为，在服务于整体改革大局的前提下，要抓住机遇，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金融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动力和新机遇。经济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换代、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金融需求多样化的要求将在更宽、更广的领域展开，这些新要求、新动力将会带动金融业更快的发展，促进金融新常态的快速形成。只有抓住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换代的机遇，加快金融自身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金融业才可能持续发展。

(3) 民众对金融产品投资、消费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要，为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遇。客观上看，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还不能满足民众的投资需求，“重融资轻投资”的功能失衡导致资本市场长期低迷，不仅投资回报率低，更有投资者屡屡被骗，远离股市成为许多中小投资者无奈的选择，而民间资金可投资的金融产品不多。近年来民间游资从黄花梨木、普洱茶、大蒜、中药材等普通商品到古董、字画等艺术品，随便对其赋予一个概念，其价格都会出现飙升，投机盛行、泡沫泛滥。这些例子充分说明民众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渴求，而如何满足民众对金融投资和服务的需求，则是金融业发展的机遇。

(4) 金融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多元化的发展，为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当今世界，金融全球化和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在这个大趋势下，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新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国际化发展的战略任务，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金融业将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更好更快地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不断提高金融业的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以提升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实力和能力。

### 四、在此背景下，金融改革与发展有两大战略目标

一方面，金融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乃是金融之本，在实体经济发展步履维艰之时，金融业却一枝独秀。应该看到，若脱离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短

期之内，金融业或许可以出现“繁荣”，但“繁荣”也易成为无源之水。放眼未来，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金融改革首要任务便是正本清源，明确服务实体经济才是金融之本，必须始终坚持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发展原则。金融业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和效率，提高金融自身防范、抵御、抗击风险的能力等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金融改革应服从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需要和国家的大战略、大目标。

另一方面，金融改革要求建设与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相匹配的金融大国、金融强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经济大国，构建一个具有强大资源配置功能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实现经济大国与金融大国的匹配，是未来整个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所谓金融大国，指的是金融机构的服务和网络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并具有强大的综合竞争实力，国内金融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国际货币主导权，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有足够的话语权。历史上世界强国通常都是金融大国。金融为英国在17世纪末的崛起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帝国。19世纪以后，美国借助金融业快速发展，华尔街对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支撑其长期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成为金融大国的重要标志，也是建设金融大国、金融强国的主要战略任务。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能为我国带来铸币税收入等诸多好处，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增加我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发言权，提高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助于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使我国在对外经济往来中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因此，要把加快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推进，以金融改革促进和保障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实现。

## 五、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战略实现路径

一是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市场化战略取向。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并将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作为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市场开放度的重要举措。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助于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促进内外经济的均衡与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也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利率市场化是货币领域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建立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有助于发挥收益率曲线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利率类产品的定价基础，促进货币调控工具由数量调控转为以价格调控为主。市场化取向的另一大看点是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继金融“国十条”之后，进一步从国家层面明确了对发展民间金融的支持。其有助于逐步促进非正规金融体系的规范化，同时倒逼银行业经营体制转型，提升银行业的整体经营效率。随着金融业门槛的降低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将为金融业投资与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机会，但同时金融风险会加大，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等战略举措，旨在有效控制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二是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法制化取向。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十八届四中全会关

于依法治国的决定为金融改革的法制化发展指明了方向。现代金融业是在一系列法律、法规下运行的，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是金融发展的基础。没有法制保障的市场化是伪市场化，只能为弱肉强食提供掠夺财富的借口。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国家都有着成熟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法律环境，不仅有利于优化金融运行的外部基础环境，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响金融安全运行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金融的核心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因此，提出“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等举措，旨在加快金融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为适应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必须制定与这些基本法律相配套的专业性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具有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金融业监管办法；同时，还应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强化金融监管的执法行为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和履行监管职能的绩效考核，确保各项监督措施落到实处。

三是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国际化战略取向。未来，金融全球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将对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经营、监管和风险抵御的能力与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要顺利完成“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金融国际化的战略任务，中国金融业要补的功课还很多。第一，要加快培养和提升中国金融业国际化的竞争力。应当充分利用金融手段，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区域，并以此延揽全球人才和科技资源，形成新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第二，要加快培养和提升国际化金融监管能力。从微观层面而言，应加快推进自贸区离案金融创新业务的拓展，为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培养人才、积累经验、完善制度。从宏观层面而言，应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目前“一行三会”的分割监管体制，构建一个安全与效率并重的国际化金融综合监管体系。从国际层面出发，中国应当采取多种途径参与全球金融监管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多边规则的制定过程，谋求更大的国际金融监管话语权。同时，加强多边、双边的国际金融货币合作与协调，促进人民币走出去，维护区域金融安全与稳定，并带动我国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第三，加快培养和提升国际化风险监控能力。在风险监控方面应当注重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控理念，打造国际化金融风险监控体系，努力使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理念、制度安排、技术手段与市场发展、业务创新水平与国际金融市场相接轨。

四是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普惠化战略取向。金融改革的大众化战略取向就是实施“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的思路，是坚持民生金融优先，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金融改革与发展成果可更多更好地惠及所有地区特别是贫穷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发展“普惠金融”，旨在降低居民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开展多种融资方式，规范发展民间借贷，拓宽小微企业多元融资渠道，提升金融的社会化程度。这意味着小额信贷、互联网金融等针对广大低收入、高成长群体的新型金融机构与模式将迎来较大发展空间。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普通百姓也将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投资的机会。

## 防范金融风险须审慎推进注册制改革<sup>①</sup>

2015年6月中下旬股灾发生后，虽然IPO暂停，但针对IPO注册制改革的预期，无论是监管层还是学术界都偏乐观。有人甚至认为，市场化的注册制改革将解决中国股市的所有问题，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大家可能只看到了美国、中国香港地区等成熟资本市场实行注册制改革的效果，但没有看到中国大陆资本市场与美国、中国香港地区资本市场，在完善的配套法律环境和严格的市场监管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笔者认为，注册制改革无疑是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但当前我国法律法规、市场机制、监管水平与监管体制等各方面的条件与IPO注册制均不配套。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IPO注册制改革面临的难度和风险之大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期。如果在推进注册制改革过程中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很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此，必须牢固树立金融风险意识，加快完善配套机制，提高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水平，为推进注册制改革创造条件。

### 一、目前IPO注册制改革的实施条件还不具备

注册制是指证券发行人依法将与证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信息和资料公开，制成法律文件送交主管机构审查，主管机构只负责审查发行人提供的信息和资料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一种制度。其最重要的特征是证券发行审核机构只对注册文件进行形式审查，不进行实质判断。只要证券发行人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虚假、误导或者遗漏，即使该证券没有任何投资价值，证券主管机关也无权以其他理由拒绝其注册。注册制的核心思想是：对证券发行不设置条件，只要满足了披露要求，任何企业皆可公开发行证券；监管者的责任是让上市公司充分披露信息，让市场对股票进行选择并定价，加强事后控制。

理想状态下的IPO注册制将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释放市场活力，这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相契合。注册制也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为企业发展构建可持续的直接融资平台。而且，与核准制相比，在理想状态的注册制下，发行人成本更低、上市效率更高、对社会资源耗费更少，有助于资本市场快速实现资源配置功能。总而言之，理想状态下的注册制将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投融资、资源配置三大基础性功能。

注册制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但也应该看到，注册制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系统性改革，是涉及市场参与主体的一项“牵牛鼻子”的系统工程，具有涉及面广、长期性和不断博弈的特点。可以说，注册制改革成功与否，直接关系资本市场能否

<sup>①</sup> 石建勋. 防范金融风险须审慎推进注册制改革【J】. 探索与争鸣, 2015, (09):33-35.

步入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期轨道。理想 IPO 注册制的实现需要优良的市场生态作为其生存基础，成熟的市场主体、完善的市场机制是 IPO 注册制的必要条件，而要实现该目标，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也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第一，扭曲的股价回归正常水平。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如此高的估值水平必然带来很多问题，当二级市场的股价处在扭曲的状态时，新股的定价一定是扭曲的，即使人为地将新股 IPO 的定价压低，上市后必然出现较大幅度的溢价。第二，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需要完善，以改变恶意“圈钱”和“套现”的行为。第三，投资者结构和投资者行为需要调整。注册制的核心是把新股定价的主导权交给市场，如果市场的投资者以散户为主导，其结果很可能是少数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合谋来欺骗散户投资者，散户将成为新制度的牺牲品。第四，要有健全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注册制下，IPO 把关者由证监会变成市场，就必须健全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让投资者能够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上市公司或其他参与主体存在违规行为时，投资者能够为自己的损失讨回公道。第五，发行、上市监管以及事后监管等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国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比美国同类案件轻得多，不足以造成对违法行为的威慑。第六，相关配套法制建设的完善，这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 二、强行推进注册制改革可能引发金融风险

尽管从长远来看，注册制改革对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正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短期来看，注册制改革面临的难度和风险非常之大。当前我国实行注册制的经济制度、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成熟度等条件都不完善，法制建设和监管改革与注册制均不配套。如果匆忙推行注册制，将可能对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导致 IPO 质量下降、IPO 数量失控；导致金融权贵对中小投资者财富的洗劫；导致沪深两大交易所出现恶性竞争，为争夺上市资源而降低审核标准等，甚至引发金融风险。

(1) 可能引起大量劣质企业粉饰报表、一拥而上，加剧资本市场波动甚至引发金融风险。若没做好充分准备，贸然实施上市门槛低得多的注册制，可能会引起大量良莠不齐的企业上市，而且由于审核制度的改变，拟上市企业粉饰业绩、包装上市的现象可能更加恶劣，IPO 质量下降的同时可能在短期内引发大量股票上市形成抽血效应，致使股市大跌，从而严重冲击市场原有估值体系，激化投融资矛盾。

(2) 可能给中小散户投资者造成巨大投资风险，引发股市动荡乃至金融危机。注册制下，证券监管机构不进行实质审核，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和持续盈利能力都需要由投资者自己来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相关保护中小投资者的配套措施，而仅仅依靠中小投资者自身有限的专业水平难以真正辨别公司的好坏。我国是世界上中小散户比例最大的国家，投资者财富被洗劫换来的只会是股市动荡不安、金融风险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安定问题。

(3) 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可能会放大金融风险。注册制在美

国的成功首先依赖于其相对完善的监管与法制，没有对财务造假、违规披露、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的严厉制裁，就没有繁荣的美国股市。在中国监管体制、法律法规以及执法体系不健全、不严格的情况下，过低的造假成本根本难以抑制拟上市公司违法造假的贪欲，这无疑放大了金融风险。

(4) 监管失误和监管错误，将是注册制下最大的金融风险。金融跨界发展给我国“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巨大挑战，2015年6月中旬以来，由于清查场外配资和监管的时空错位，导致沪深股市连续暴跌，投资者损失惨重，IPO被迫暂停。这次发生的股灾，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金融分业监管模式远远落后于互联网金融跨界发展的现实。近年来，在互联网金融创新所创设的银行资金隐蔽进入股市的各条链条上，金融监管者都只能分别监管到其中的一环或几环，而无法形成全链条、全业务和全方位的闭环监控，从而留下了监管的“真空地带”，在投机者寻求制度套利的博弈中滋长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 三、加快完善配套体制机制，为推进注册制改革创造条件

#### (一) 加快完善监管体制，提高监管水平

监管改革的体制、机制要加快转变，重心后移，加大违规处罚、司法惩戒力度。在美国，上市公司将IPO看作“开学典礼”，因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更强调IPO之后的严厉监管；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却将IPO看作“毕业典礼”，因为中国证监会更注重IPO之前的审查与核准。这就是监管体制与监管理念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监管效果。加快推进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应尽快建立混业监管体系。现行的“一行三会”监管体制需要创新设计，既要明确责任和分工，又要建立起规范化、制度化的跨部门、跨领域信息共享与监管协调机制，加强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合作。在目前条件下，宜适时成立跨部门权威机构——国家金融风险监管委员会，对金融风险集中统一监管，协调各专门监管机构统一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前进行有效防范，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

#### (二) 加快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建立更加严苛的造假违规处罚与投资者赔偿制度

除修订《证券法》外，其他配套法律应该加快配套立法。宜重新修订《证券法》《公司法》《民法》等相关法律中有关证券犯罪的相关条款，严惩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欺诈上市、信息造假等证券犯罪行为。同时要加强执法，再好的法律不执行等于没有。要建立并完善市场打假机制和集体诉讼机制。市场打假与集体诉讼是一股来自民间和市场的重要“监察”力量，它可以弥补政府的单一行政监管的不足，形成强大的市场威慑力，既有利于倒逼上市公司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净化市场，也有利于让投资者学会自我保护、自我维权。应借鉴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度，让专业的律师机构通过有偿服务的方式投入投资者的维权过程中，中小投资者能力范围有限，并处于信息最边缘，应在举证责任、赔偿范围、

诉讼与索赔程序等方面，适度向中小投资者倾斜。同时，坚持赔偿规则的可操作性与可诉性，对赔偿规则予以类型化、具体化，对欺诈发行、违规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情形下的赔偿规则分别作具体规定。

### （三）加快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与约束机制

强化对上市公司在健全公司治理及内控方面的监管，强化资本约束、市场约束和诚信约束等，督促上市公司不断提高其治理水平和公司透明度。完善和细化《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规中有关上市公司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买卖本公司股票的限制性规定，无论其是采取间接方式还是直接方式持有上市的公司股票，其减持都应受到约束，以此维持此类人群持股的相对稳定性。新增现金分红制度，如果上市公司少分红或不分红，投资者将资金投入股市只能单纯依靠赚取股票价差获利，等于是变相鼓励了投资者进行短线投机套利，企业也无法获得长线资金进行长期发展。

### （四）加快完善股票退市制度

有步骤地落实股票退市制度，提高退市效率。美国股市“大进大出，大浪淘沙”，得益于高效率的市场化退市机制，比如近十年来，有超过一半的美股退市都是源自“1美元退市法则”的作用。在中国，急需尽快启动多元化退市制度，重新恢复股市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功能。同时，突出退市的市场化。基于种种考虑，地方政府往往不愿意当地的上市公司退市，便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费等行政托底手段，把处于退市边缘的企业拉回来，由此导致垃圾公司白白占用宝贵的上市资源，最终使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此外，投资者花费大量资金购买企业股票，若退市后没有处理好投资者补偿问题，使投资者蒙受大量损失，将动摇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因此，宜建立、健全投资者补偿制度，探索退市保险机制，确保退市后投资者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制度保障。

### （五）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完善市场层次，搭建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分散过多企业融资对市场的压力，优化企业融资结构，同时为投资者提供组合投资、分散投资的市场条件。中国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主要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包括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现货市场及衍生产品市场。确立上市标准的多层次取向和高标准取向，针对不同的板块，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设立不同的挂牌标准，使各类不同阶段的企业都能在不同的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为场内市场的上市条件设立高标准，有利于遴选最优秀的企业上市。设立转板标准和转板程序，完善各市场间有机转板和退出机制，如打通新三板和创业板的转板通道和未来上交所战略新兴板的转板通道，使新三板挂牌企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转板机制转到不同层次的场内市场，而其他市场中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则转至新三板市场，从而盘活多层次资本市场。

## （六）加快完善对机构投资者群体的培育和约束机制

提高机构投资者占比，大力培育多样化机构投资者群体。在进一步扩大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国外的私人养老金、基金会、慈善基金、金融机构、境外基金等）的同时，做大做强证券投资基金。美国“机构市”有两大标志：一是接近美股总市值规模的共同基金（14万亿美元）；二是超过美股总市值规模的私人养老金（20万亿美元），遏制机构投资行为散户化。在美国，法律严格规定公募基金、社保基金等机构不准投资高风险行业，若要投资某一个企业，也必须要求企业长期强制分红。中国要完善对投资者的约束和监管水平，遏制机构散户化的现象。

## 着力构建资本市场六大平衡<sup>①</sup>

投资功能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资本市场失去了投资功能，吸引不了投资者广泛参与，就会失去融资功能。构建一、二级市场的平衡，其指导思想是降低一级市场的高利润水平，对二级市场投资者利益给予更多的保护。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而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无疑为今后资本市场改革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加快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着力构建资本市场六大平衡。

### 一、构建融资者利益与投资者利益的平衡

数据显示，2005—2015年6月底，沪深两市各类融资总额达5.96万亿元，累计分红总额为4.51万亿元，而2009年至今累计回购仅128.94亿元，若按“融资一分红一回购=净融资额”进行简单计算，净融资额达到1.45万亿元。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分红比例整体偏低，回购更是少之又少，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得的资金总额远大于通过分红、回购等方式回馈给投资者的收益，投资者投入资本市场的资金远大于从资本市场获取的收益，融资者与投资者利益失衡严重。如果投资者在资本市场长期损失惨重，信心和热情一次又一次地被伤害，长此以往，远离资本市场就会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sup>①</sup> 石建勋，王盼盼. 着力构建资本市场六大平衡【N】. 证券时报，2015-12-02（A11）.

众所周知，投资功能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若资本市场失去了投资功能，吸引不了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就会失去融资功能，最终资本市场将会一“熊”不振。因此，推进注册制改革必须着力构建融资者与投资者利益的平衡，使资本市场从“重融资”转向“重回报”，从“融资市”转向“投资市”。

构建融资者利益与投资者利益的平衡，其指导思想是从制度层面约束企业真正为投资者着想，强化上市公司积极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具体内容如下。

### （一）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与内控机制

强化对上市公司在健全公司治理及内控方面的监管，强化资本约束、市场约束和诚信约束等，督促上市公司不断提高其治理水平，以提高公司透明度，加强对公众投资者的保护。

### （二）加强对“董监高”的减持约束

完善和细化《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上市公司“董监高”买卖本公司股票的限制性规定，无论“董监高”是采取间接方式还是直接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其减持都应受到约束，以此维持“董监高”持股的相对稳定性，使其利益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持一致。

### （三）新增现金分红制度

上市公司少分红或不分红，投资者将资金投入股市只能单纯依靠赚取股票价差获利，这变相鼓励了投资者进行短线投机套利，企业也无法获得长线资金进行长期发展。通过提高分红比例、回购等方式把收益回馈给投资者，让投资者能够获得稳定持续的投资收益，真正分享到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从而保持资本市场可持续的吸引力。

## 二、构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平衡

我国一、二级市场严重失衡，根本原因在于二者风险收益水平极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资金争夺、发展不协调和利益分配机制失衡。一级市场高收益低风险，二级市场低收益高风险，导致投资者热衷于申购新股（打新），在一级市场申购新股后再到二级市场抛售，充当资金的“循环搬运工”。这既会造成二级市场资金不断撤出并大量流入一级市场，对二级市场产生严重冲击与破坏，又会导致一些业绩差的公司股票价格被抬高；二级市场投资者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却得不到相应收益，由此引发一、二级市场严重失衡，并导致资金的恶性循环。但如果二级市场持续低迷，资金不断从二级市场流向一级市场的恶性循环则将最终导致一级市场申购到的新股难以在二级市场卖出高价。因此，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相互平衡，并且互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条件，是保证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行注册制改革的前提条件。

构建一、二级市场的平衡，其指导思想是降低一级市场的高利润水平，对二级市场

投资者利益给予更多保护，从而让二者之间风险与收益水平逐渐趋向均衡。具体包括：改进新股定价形成机制，推动实现新股发行市场化，以抑制新股高价发行。完善股票退市制度，鼓励长期资金入市，将保护二级市场公众流通股股东利益真正落到实处。引入不对称比例配售制度。中国香港资本市场在新股发行上所采取的是不对称比例配售措施，面对大量申购者，采取不均衡分配的办法予以配售，使申购量少的账户获得配售的比例高、申购量大的账户获得配售的比例低。通过引入不对称比例配售制度，有效遏制资金流入一级市场，化解一级市场申购的规模效益，以此来平衡其与二级市场的矛盾，从而使整个资本市场的风险与收益水平大体相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利益格局更加和谐。

### 三、构建融资速度与引资速度的平衡

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与引资速度失衡源于长期以来只注重融资而不注重将储蓄资金引入实体经济，大量资金囤积在投机领域追求一夜暴富，既无法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也使得资本市场泡沫越滚越大。我们知道，资本市场存在的首要目标是服务实体经济，而且实行注册制的初衷便是让更多优秀的企业可以融到资金，以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应该看到，若脱离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短期内，资本市场或许可以出现繁荣，但这种“非理性的繁荣”既背离了注册制改革的初衷，也提升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风险。因此，构建融资速度与引资速度的平衡，加强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既是实现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之本，也是注册制改革的成功之基。

### 四、构建上市与退市的平衡

注册制下企业上市数量会大幅提高，这就需要有一个健全有效的常态化退市机制与之对应，否则长时间只有上市没有退市必然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各种弊端。一个健康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有进有退、动态平衡的市场，在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退市是常态化的。因此，构建常态化退市机制，维持上市与退市的动态良性平衡，是推进注册制改革的重要前提。

构建上市与退市的平衡，首要任务就是加快完善股票退市制度。具体包括：

(1) 有步骤地落实股票退市制度，提高退市效率。美国股市“大进大出，大浪淘沙”，得益于高效率的市场化退市机制，中国亟须尽快启动多元化退市制度，重新恢复股市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功能。

(2) 突出退市的市场化，管住地方政府“闲不住的手”。基于种种考虑，地方政府不愿意当地的上市公司退市，便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费等行政托底手段，把处于退市边缘的企业拉回来，由此导致“垃圾公司”仍白白占用宝贵的上市资源，使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

(3) 解决好退市后对投资者的补偿问题。投资者花费大量资金购买企业股票，若退市后没有处理好投资者补偿问题，使投资者蒙受大量损失，将动摇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建立、健全投资者补偿制度，探索退市保险机制，确保退市后投资者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制度保障。

## 五、构建多方与空方的平衡

注册制改革的推出需要一个平稳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这就要求保持资本市场中多方与空方力量的平衡。市场的涨落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多空双方的博弈使得市场在小幅范围内有涨有跌，长期内看涨的多方与看跌的空方基本处于平衡，而不会出现单边市的暴涨暴跌。

构建多空平衡，其指导思想是培育投资者的价值投资理念、鼓励长期投资，遏制机构投资者散户化行为、市场操纵行为等。具体内容包括：

(1) 建立上市公司强制分红制度，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通过强制性分红使投资者能够获得持续稳定的收益，而不是仅通过博取差价获利，以此激励投资者长期持有股票，而非短期投机套利。加快完善对机构投资群体培育和约束机制。提高机构投资者占比，大力培育发展多样化机构投资群体。

(2) 在进一步扩大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国外的私人养老金、基金会、慈善基金、金融机构、境外基金等）的同时，做大做强证券投资基金。遏制机构投资行为散户化现象，完善对机构投资者的约束和监管水平。

(3) 努力培育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的衍生品市场健康发展。海外股指期货多年来的成功运行经验表明，股指期货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件，发挥着股市稳定器和避风港的重要作用。在试图与国际接轨大力发展股指期货市场的同时，学习借鉴海外成熟配套的管理制度也至关重要，通过完善配套管理制度，严格监管程序化交易，抑制股指期货过度投机，从而将股指期货约束在健康合理的发展轨道上，让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完善，而不是沦为金融权贵掠夺和转移中小投资者财富的加速器。美国股市平稳健康运行的两大制度基础——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制度，是中小散户遏制主力操纵的重要武器，值得我们进行借鉴。

(4) 加快监管体制机制改革。监管重心需后移，并加大违规处罚与司法惩戒力度。要加快推进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尽快建立混业监管体系。现行的“一行三会”监管体制需要创新设计，既要明确责任和分工，又要建立起规范化、制度化的跨部门、跨领域信息共享与监管协调机制，加强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合作。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体系和跨市场实时监控体系，有效识别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现象，研究制订指数熔断机制方案，以加强对资本市场风险的整体监控。

## 六、构建造假者与打假者的平衡

造假可以让企业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必须有发达完善的打假机制与之对应，通过广泛、严厉的打假活动，揭露企业违法造假行为，并予以重惩，使之为其造假行为所付出的代价远高于造假所得。应努力构建资本市场造假者与打假者的平衡，通过鼓励打假、严惩造假，将上市公司欺诈造假行为扼杀在萌芽中，促进形成更加规范的市场环境，为推行注册制改革创造条件。

构建造假者与打假者的平衡，其指导思想是对造假行为尽快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对打假行为尽快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从而让造假者付出巨大的代价，让打假者得到应有的保护。具体内容包括：

(1) 建立并完善市场打假机制和集体诉讼机制。市场打假与集体诉讼是一股来自民间和市场的重要“监察”力量，它可以补充、辅佐政府的单一行政监管的不足，从而形成强大的市场威慑力，有利于倒逼上市公司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净化市场，也有利于让投资者学会自我保护、自我维权。应着力打造一大批中国专业性“打假”公司，发挥和动员社会和市场的力量进行打假，弥补监管层打假人力的不足，专业性“打假”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投资者权益，可以对上市公司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增加上市公司造假成本，使上市公司不敢造假。同时，也应借鉴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度，让专业的律师机构通过有偿服务的方式投入投资者的维权过程中，以此真正有效地保护中小投资者。

(2) 完善投资者赔偿机制。中小投资者能力范围有限，并处于信息最边缘。应为中小投资者实行倾斜保护，在举证责任、责任构成、赔偿范围、诉讼与索赔程序等方面，适度向中小投资者倾斜，这方面应借鉴美国的辩方举证制度。同时，坚持赔偿规则的可操作性与可诉性，对赔偿规则予以类型化、具体化，对欺诈发行、违规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情形下的赔偿规则分别作具体规定。加快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培育更加严苛的法律生态环境，让打假者有法可依。

### “钱荒”：“荒”的到底是什么<sup>①</sup>

2013年6月20日的最新数据显示，上海银行间利率再次全线上涨，达到惊人的13.44%，该数值已创下历史新高。就在银行间市场“钱荒”的同时，沪深股市全线下跌，投资者开始纷纷减持手中资产，股市资金流出明显增加。债市也陷入了“钱荒”的困境，

<sup>①</sup> 石建勋.“钱荒”：“荒”的到底是什么【N】.文汇报，2013-06-25（005）.

继农发债流标之后，新发的9个月期国债重蹈覆辙。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真的陷入流动性紧缩的“钱荒”了吗？

## 一、中国经济“不差钱”

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5月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同比增速依旧高达15.8%，新增信贷量仍然高企，人民币存款余额也已经逼近百万亿元的大关，1—5月社会融资规模达到9.1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了3.12万亿元。从5月末的人民币贷款余额看，这一数据为67.22万亿元，同比增长14.5%；而1—4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增量高达15 097.41亿元，月均增量约3 774亿元，而2012年全年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新增总额也不过4 946.47亿元。这意味着，整个银行体系的存量流动性依然处于高位，所谓的资金紧张是结构性的。

现实中的货币供应量也很充裕，不少机构和个人依然出手阔绰，大量购买各类银行理财产品 and 信托产品，国内房价居高不下，交易活跃，国外房地产市场的中国买家增多，社会游资抢购黄金被套，仍在积极寻找投资机会，民间借贷依旧活跃。

## 二、改革与监管远远滞后

一方面，数据和现实情况说明，中国经济“不差钱”；另一方面，银行缺钱，股市缺钱，中小企业缺钱。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钱荒”？从表面上看，目前的“钱荒”是由于临近月末、季末、年中，存款准备金率的缴存、财政存款的上缴、企业分红以及银行年中考核等多种因素叠加，使资金紧张程度加剧。此外监管部门强化理财产品监管以及加大对跨境套利交易的抢制，也导致各银行需要增加资金以满足合规要求。但从根本上看，目前“钱荒”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近年来金融业特别是银行的过度扩张，金融业的改革与监管远远滞后于其发展的速度，金融体系的发展及其运营管理体制已经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不差钱”，缺的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完善机制和体制保障；中国股市“不差钱”，缺的是信心和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 三、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

近年来，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所注入的资金其实并没有都投入实体经济当中，大量的资金只是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套利”，不断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取利差，资金在各个金融机构间循环往复获取利润。除此之外，具有规模优势的国有企业以及一些过度圈钱的上市公司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从而使其能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进行套利，由此导致资金的重复计算，进而导致社会融资总量的虚增。近几年的新增贷款大部分并不是从传统信贷渠道流出。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有大约一半的新增贷款是通过信用证、

租赁或其他非正式贷款的方式发放的，这就是近年来越来越多被人提到的“影子银行”（金融体系中可以发放贷款但却难以监管的部分银行业务）。“影子银行”规模的无限制扩大，既挤压了实体经济急需的资金，也不断累积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由此可见，目前的“钱荒”并不是货币政策收紧所导致的，而是过去几年金融体系借助国内外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脱离实体经济盲目发展，金融资产过度膨胀在一个时间点的集中爆发。

不可否认的是，眼下中国的“钱荒”多少也与美国拟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热钱流出的预期有关。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见效，目前美国经济复苏迹象比较明显，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是必然的选择。而一旦美国实施量化宽松退出战略，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以及资产价格必会受到新一轮的冲击。对此，世界各国要有充分的准备，不能因为暂时的“钱荒”而释放流动性，从而导致更大的损失。

#### 四、要“用好增量、盘活存量”

目前的“钱荒”是暂时的，暴露出的问题已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未来如何“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将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与发展需要破解的大课题。

第一，要持续加强流动性监管。在这场被称为中国银行业“历史最严重资金短缺”中，央行并没有施以援手，打破了市场关于央行“放水”的惯性期待。这或许反映了新一届政府应对金融风险隐患的强硬姿态，意在整顿社会融资规模过快扩张与银行同业业务期限错配风险，倒逼银行加快其去杠杆和去“影子银行”的进程，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第二，对待“影子银行”治理要从源头入手，更多地把不透明的“影子银行”转化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和商业票据市场。此外，要降低地方政府高杠杆扩张和融资冲动，改变大量资金体外循环，真正把金融活水引入实体经济，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第三，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不大，贷款是半市场化定价，对大企业，基本上是按照基准利率，对中型企业则开始往上浮动，对于部分能够贷到款的小企业，甚至上浮到基准利率的好几倍。目前我国的息差超过3%，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未来，应该实施差别化的信贷政策，促进银行之间的良性竞争以及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第四，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金融市场的垄断性，促进民间资本进入，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

第五，改革银行现有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建立有激励和约束的长效机制，综合采取政府支持与社会扶助等多项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 当前境外“热钱”中国流向<sup>①</sup>

热钱与正当投资的最大区别是热钱的根本目的在于投机盈利，而不是制造就业、商品或服务，也不会长期投资于某项金融资产，但它的巨额流动却会给一个经济体和区域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和影响。关于热钱危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8年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资本家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所以热钱的流向和规模一直是各国央行监控的重点。

### 一、热钱流入的阶段性分析

国际上对于热钱规模的衡量一般以外汇占款与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作为主要参数，在此主要根据这个指标，同时参考外汇占款和银行代售汇的情况对近几年以来的热钱流动情况进行分析。基本上可以把次贷危机以来热钱的流动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巨额流入阶段（2007年10月—2008年7月）。**从2007年10月开始，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加剧，整个国际资本的风险加大，急于寻求避风港，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国内的流动性依然过剩，在2007年9月和12月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人民币与美元的价格差异造成热钱急剧流入并买入人民币资产。从2007年年底到2008年中旬，热钱流入数量逐月增加，在2008年7月到达了2500亿元的峰值，大大超过金融危机之前月度平均流入500亿元的水平。这个阶段的热钱中的大部分变成了存款，表现出了很明显的避险特征。

**第二阶段：流入放缓和快速流出阶段（2008年8月—2009年1月）。**这一阶段中，首先是国内经济持续走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开始不明朗，并引起了“热钱”的忧虑；其次是雷曼兄弟公司在2008年8月的倒闭，造成了欧美短期资本对流动性的极度恐慌，所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撤离中国。热钱数量从2008年8月开始逐月减少，2008年年底和2009年年初甚至出现了热钱数量负增长的情况。热钱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从巨额流入到流入放缓再流出的“过山车”式的变化过程，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第三阶段：第二次加速流入阶段（2009年4月初—2010年3月末）。**这一阶段热钱加速流入的推动因素是美国推出第一次量化宽松政策（QE1），QE1主要包括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国际热钱开始转向押宝人民币升值，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QE1释放的流动性，使得热钱流入我国逐月增加，在2010年3月达到了1500亿元的峰值。

<sup>①</sup> 石建勋，郑超洪.当前境外“热钱”中国流向【J】.人民论坛，2013，（13）:48-50.

第四阶段：第四次加速流入阶段（2010年9月初—2011年年末）。这一阶段热钱加速流入的推动因素是美国推出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QE2），总额为6 000亿美元的QE2包括美联储斥资购买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券，每个月购买额为750亿元，直到2011年第二季度。201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加息，热钱流入开始加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由于利差因素和避险需求，外汇占款一直保持月度平均3 000亿元的高位。伴随着热钱的巨额涌入，国内的商品价格水平开始一路走高，央行的政策调控重点开始转向抗通胀。

第五阶段：加速流入阶段（2012年9月末—2013年3月）。从2012年9月开始，全球范围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先是美联储在2012年9月和12月推出了QE3和QE4，而欧洲央行宣布启动“无限量冲销式购债计划”（OMT），澳大利亚、英国等相继跟进，全球流动性再次大规模泛滥。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也在2012年第四季度开始跟进，实施了多次更大规模的“开放式”的量化宽松政策。发达国家这些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溢出效应和累加效应造成了我国的外汇占款在2013年1月和2月的巨额增加。其中，1月外汇占款达到了6837亿元，创历史新高，超过了2012年全年的增量，热钱涌入迹象明显。

## 二、热钱频繁进出的负面影响

热钱频繁地进出，给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热钱流入导致国内通胀压力加大。热钱的流入加大了外汇占款的规模，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热钱带来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对我国的通货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热钱往往通过炒作大宗商品带动产品价格的结构性的上涨，进而引发商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国内通胀压力加大。

（2）热钱流入推高资产价格，造成经济虚假繁荣。热钱在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同时，乘机在其他市场，如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其他市场不断寻找套利机会。最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远远超过消费物价指数，不排除一些套利资本进入了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很多房地产开发商之所以不愿意降低房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国际热钱心存幻想，而能够吸引国际热钱进入中国楼市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人民币的大幅升值。

（3）热钱流入助长了投机风气。热钱的高流动性是其套利的保证，其引发的虚假繁荣的泡沫很容易随着热钱的撤离而破灭。民众盲目跟风易被误导，导致跟进的投资者损失惨重。这种投机风气在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蔓延也不利于我国的经济转型。

（4）热钱流入导致我国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困境。首先，境外热钱的流动经常干扰央行对于国内形势判断，很多政策出台没有打击到热钱反而损害了国内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影响了正常的货币供给；其次，央行对于外汇占款造成的流动性冲击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

作来冲销，这增加了央行的操作成本；最后，央行通过提高利率方式执行紧缩货币政策时容易引发热钱流入，使我国“稳增长、控通胀”等多重政策目标实现难度加大，使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困境。

(5) 热钱频繁进出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现阶段，各国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加上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都会让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热钱不断流入，而一旦美国经济向好，人民币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热钱就会迅速流出，到时候热钱的抽离必然会冲击我国国内的各个市场，破坏我国金融的稳定性，甚至会拖累实体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 三、热钱来袭的应对之策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要更加及时、审慎、细致，更加具有前瞻性、准确性和灵活性。目前，中国实体经济“滞胀”特征明显，在此背景下，各路热钱带来的外部输入性通胀的“不可控、难调节”将使我国“稳增长、控通胀”等多重政策目标实现的难度加大，使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困境。对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要尽可能使用数量手段对冲流动性，避免本国货币过快升值，始终对抑制通胀和房地产泡沫采取高压态势，防止通胀水平和房地产价格的借机反弹。

第二，采取有效措施，稳定人民币汇率，尽可能降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人民币汇率改革仍然要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稳步推进，同时要加强对资本流进和流出的监管，严厉打击跨境资金违规流动，防止热钱等违法、违规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特别是要防止其流入股市楼市，导致资产泡沫的产生。

第三，转变监管原则，严厉打击热钱。针对热钱流入的途径和规模变动的特点，对于热钱的监管原则要从“宽进严出”转向“严进严出”，既打击热钱的流出，也要控制热钱的流入，做到均衡管理。在具体的措施上，应该严厉打击虚假贸易和地下钱庄等热钱进出渠道，从源头上狙击热钱；引进外资要加强项目审查，各地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DI）要加强管理，确保外商直接投资能够被实际利用到实体经济部门，严防 FDI 热钱化。如果在对热钱的管理问题上掉以轻心，很可能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四，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以降低美元霸权、美元泛滥对中国和世界经济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反思中国现有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制造的产品出口倍增，相应的人民币的购买力也大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就应该对其他货币升值。但多年来，我们坚持和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结果却为自己积攒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自己的货币供应量也大幅增加。这一点值得深思。

## 互联网金融创新理论及其对传统金融的挑战<sup>①</sup>

### 一、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理论依据

互联网金融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其作为“互联网”与“金融业”相互融合的产物，尽管出现了诸多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业务，然而对互联网金融的相关研究仍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性层面，少有研究从理论上对互联网金融进行解析。研究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内涵。

(1) 信息经济学理论。该理论研究什么是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交易契约，故又称为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互联网金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2) 金融中介理论。该理论解释了金融中介的存在原理，由于小企业信贷具有逆向选择和高交易成本等特点，与风险规避要求有所冲突，因而金融中介机构通常不会完全满足小企业的借款需求。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中介，一方面可以通过网络化方式超越传统金融中介和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使投资门槛大大降低，各种金融交易大大简化，市场的参与者更为大众化，互联网金融形成“充分交易可能性集合”。

(3) 声誉理论。互联网金融依托大数据，能够快速计算得出个体声誉水平和状况。基于此发展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如P2P、众筹网站的声誉，是其重要的资本。

(4) 长尾理论。该理论是互联网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由于互联网独特的特征，规模越大其总收益和边际收益就越大，越能形成规模经济。

(5) 优势理论。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可以实现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利润的最大化。

(6) 交易费用理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交易费用理论最大的冲击体现在三个方面：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加速了金融脱媒。

### 二、传统金融受到的冲击及其应对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未来将催生一种不同于传统金融的具有革命性的新型金融。

第一，互联网虚拟网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银行的物理网点。以金融中介理论分析，互联网金融能够突破时空局限，灵活地服务于广大时空范围的消费者。特别是当移动用户的手机终端被广泛连接银行的客户终端后，银行的物理网点会越来越少，员工人数也会大幅度下降，这对银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第二，互联网金融可以大幅度降

<sup>①</sup> 石建勋. 互联网金融创新理论及其对传统金融的挑战【J】. 探索与争鸣, 2014, (12):23-25.

低业务成本。欧洲银行测算单笔业务成本，营业点是 1.07 美元，电话银行是 0.54 美元，ATM 是 0.27 美元，而通过互联网仅是 0.1 美元。一般而言，银行通过在线支付的虚拟成本是通过物理分支机构支付的 1/16 到 1/6。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本降低，也完全符合交易费用理论对互联网金融的解析。第三，大数据信息集散处理将大大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的风险控制效果。互联网产生大数据，集合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可以通过事实分析和挖掘客户交易信息，掌握客户消费习惯，准确预测客户行为，在互联网金融和营业风险控制方面有的放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信息集散处理，互联网金融将大大提升金融服务于风险管理的效果。第四，互联网金融为金融业带来互联网精神和普惠金融精神。余额宝让普通大众的理财成为指尖上的乐趣和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在给传统金融注入普惠金融的新理念和新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竞争。

用优势理论概括而言，由于互联网金融突破了时空局限、大大降低了成本、凭借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集散处理优势，以及“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精神，因偏远分散、信息太少、成本居高、风险较大很难得到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或能从互联网金融那里得到有效而可持续的金融服务。

互联网金融仅能颠覆无法自我革新、跟不上时代节奏的传统金融企业，而不能颠覆金融本身。传统金融方式在解决大额综合金融方案、财富管理等方面，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互联网金融只是金融生态融合进化到一个更高境界的过程，是金融变革的一种过渡形态。互联网金融更多的是推动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化，搭建信息化平台，加强用户体验，通过金融产业链分工及细化，来共同促进普惠金融。未来，金融与互联网将更紧密的融合，金融综合化、全能化、大众化发展将成为必然趋势。

当然，传统金融也要汲取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精神实质，加快自身的转型升级步伐。

其一，加快培育具有互联网思维和普惠金融的创新团队与创新精神。其二，充分利用好传统银行自身信息充沛、资金雄厚、客户广泛、网点众多、专业人才齐全等优势，借鉴互联网带来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创造更多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其三，加快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信息集散处理功能，提升金融业服务与风险管控的能效。如通过社交网络或电子商务平台挖掘各类与金融相关的信息，掌握客户消费习惯，预测客户行为，使银行在营销和风控方面有的放矢。

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创新以及变革，一方面有“成本低、效率高、覆盖广、发展快”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存在“风险大、监管弱”的突出问题。要想促进金融市场化发展，“管就死、不管就乱”的现象必须解决。因此，金融监管必须及时填补监管缺失，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到位”而“不越位”，在充分监管的同时保持金融创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有待完善。相比较而言，美国整体征信环境相对成熟，而我国整体征信基础较为薄弱，有征信的企业和个人比例较低，这将大大增加互联网金融实现的难度。因此，需要积极创建良好的法制环境，完善黑名单体系，强化风险控制机制，提高征信工作质量和效率，推进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建设。此外，互联网金融监管应完善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健全互联网企业内控制度。

## “互联网+金融”需要创新监管方式<sup>①</sup>

从长远发展来看，适应“互联网+金融”跨界发展的挑战，一方面，需要依靠金融大数据分析方式进行金融监管手段的创新；另一方面，要构建适应混业经营的综合监管模式，紧紧围绕着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创新监管方式、及时填补监管漏洞，设计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体制和机制，推进“大金融”格局下混业经营的金融监管创新。

### 一、金融混业经营将以新形式出现

这种实践就是用互联网技术打破信息壁垒、以数据跟踪信用记录，用方便快捷的支付平台和低门槛高收益的理财服务吸引个人用户，用融资服务吸引商户，再通过对商户的现金流、商品流、信息流等大数据的分析，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灵活的线上融资服务，在提高用户黏度的同时，也节约了银行自身的运营成本。“十三五”时期“互联网+金融”将继续呈现双向发展态势：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将更深地涉足金融业；另一方面，传统金融企业的互联网化运营也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从而导致整个金融业态发生巨大变化，金融混业经营将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互联网公司通过电子支付系统与各类金融产品供销紧密衔接，从支付业务向理财业务、信贷业务、资产管理业务逐步渗透。“互联网+金融”不再仅仅是不同金融牌照下业务的交叉和趋同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互联网电商和金融服务业之间的跨界经营，这种金融跨界经营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也考验着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也对目前我国金融分业监管的体制带来了新挑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二、加快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

如何适应“互联网+金融”跨界发展和混业经营的要求，制订适合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准则，如何创新监管方式，做到既能有效控制和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又能不阻碍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这是“十三五”时期我国金融监管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大课题。

加快金融监管改革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点改革应有三项。

第一，要加快有关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对互联网金融在业务准入和风险管理方面加强监管。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活动经常突破现有的监管边界，甚至可能触及非法集资、非法经营的“底线”。P2P网络平台卷款逃跑和倒闭的事件，也给相关人员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影响了社会稳定。应抓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其中包括设计互

<sup>①</sup> 石建勋.“互联网+金融”需要创新监管方式【N】.文汇报,2015-05-19(005).